

導言<sup>\*</sup>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為社會主義運動樹立了劃時代的里程碑。十月革命不僅激勵了全世界追求人類解放的人們，革命後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更建立了「第三國際」支持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促成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滾滾洪流，浩浩蕩蕩，洶湧澎湃，捲起千堆雪，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這個世界革命浪潮中的一大成就。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不但使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發生數千年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根本變化，重建了中國的獨立自主，更在蘇聯變質、實行修正主義、背離馬克思主義後，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建立了新的里程碑，激起全世界反資、反帝的狂飆。但文革未竟其功，中共在文革結束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蘇聯及其附屬的東歐集團亦於一九九〇年代相繼崩潰，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似乎社會主義已成了渺茫無望的空想，在許多人心中喪失了吸引力。

然而，自八〇年代開始的資本全球化，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愈

---

\* 「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反思俄國革命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於2017年10月21、22日分別在台大校友會館和世新大學管理學院舉辦兩場座談會，活動由《批判與再造》主辦，由「新國際」和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協辦。本刊整理兩場座談會的完整發言，並依發言順序刊登，以此製作專號。特別感謝活動主辦方《批判與再造》杜繼平為專號撰寫導言，並且在專號整理與協調過程中的大力協助；並感謝蔡明德為本專號提供他所拍攝的座談會照片。

airiti

益橫行無忌，在資本為求利潤不擇手段的無窮貪欲與嗜血本性下，越來越多人的生計無著，貧富差距日形擴大，階級矛盾不斷加深，自然生態遭受的破壞也有增無已，人類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世局動盪不安，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衝突、暴亂，此起彼落，無日無之。這也正是我們認真反思人類前途的時刻，究竟人類能不能擺脫資本主義？我們能不能破除淺薄、扭曲的反共宣傳，在理性地反思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實事求是地總結正反兩面的經驗，重建社會主義的路線？這是我們在2017年10月21、22日兩天舉辦「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反思俄國革命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座談會的主旨。

由於1949年後，國民黨在台灣實行了三十多年的反共白色恐怖統治，視社會主義如洪水猛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被斬草除根，台灣猶如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思想的荒漠，絕大多數人對社會主義充斥著誤解與偏見，這種情況即使在解除戒嚴後也沒有大幅的改變。因此在俄國革命百週年之際，舉辦這場座談會，對破除長期累積的固有成見，特別具有意義。

這次座談會邀請了美國的金寶瑜、大陸的陽和平、台灣的陳信行參與座談，大陸著名的左翼作家曹征路在第二天也參與了討論，可惜他的發言部分因故未能全部刊載，但這次座談會仍發揮了促進分居不同地區的中國左翼知識分子交流的作用。座談會從不同方面深入探討了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雖因時間所限，未能更全面地論及總體的成敗得失，尤其在遭遇的困難與所犯的錯誤上，談得太少，但讀者只要用心閱讀，必可有不少的收穫。

## 引言

### 百年來社會主義歷史的簡要回顧

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座談會，我們今天要藉著紀念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的機會，回顧這一百年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再展望未來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了從美國回來的金寶瑜教授；信行是世新大學社發所的副教授。陽和平比較特殊一點，他雖然是美國人，但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所以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直到1974年左右都在大陸生活，所以也親自經歷過文革，他今天要談論的文革不是憑著紙上的或是間接的傳聞而獲得的一些了解。



另外我要特別介紹一下大陸知名的現實主義作家曹征路先生也來到了現場，他是大陸很知名的作家，他的小說，比如說《那兒》、《問蒼茫》在大陸都造成了受矚目的效應。另外他很重要的一本小說，專門描寫文革的，叫《民主課》，是在台灣發行的，因為在大陸發行不了，所以我們就促成它在台灣出版，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之後反應非常好，普遍獲得好評。曹先生不單文筆非常細膩感人，又是一個有思想的作家。他不是一般只講求文學技巧，做一些浮面的、感情的表現的作家，他是有深度思考的作家。大家如果讀過他的小說就知道，他不是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那一種脫離現實的、庸俗的作家。他能夠順道來我們現場，我們覺得非常難得，所以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明天的第二場會有一段長時間的跟朋友的討論，到時候他也會發表他的一些看法，談一談他在大陸生活的歷史經驗。

今天由我開始每位談三十到三十五分鐘，最後會留半小時左右的討論時間請大家提問來互相交流。

首先由我來引言。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辦這次座談會的目的，以及對這百年來的社會主義的運動的一個簡要的回顧。因為時間不長，所以我只能大致提要鉤玄地把重點敘述一下，表達我對這一百年來社會主義歷史的一些看法。

一般人對社會主義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的認識，都停留在比較簡單、膚淺的說法上面。比如說對於蘇聯為什麼崩潰以及中國大陸從1949年之後一直到現在曲折發展的過程，通常，尤其是在台灣這樣一個幾十年來都被反共宣傳所籠罩的社會，都有簡單、粗糙又錯誤的認知：社會主義就代表了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凋敝，是一種行不通的社會模式；從中共的走資到蘇聯、東歐集團的崩潰，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的思潮由英國、美國帶頭，橫掃全球，更是加深了這種錯誤的認識。所以我們今天希望能夠澄清這些誤解，希望能夠真正地對社會主義的歷史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首先我要簡要分析蘇聯革命跟中共的革命，它們為什麼會發生？它們建

airiti

立了革命政權之後幾十年的發展，有什麼樣的成就？碰到什麼樣的問題？然後其他幾位主談人會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地去深化、分析關於整個社會主義在蘇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

首先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一般人由於沒有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通常只會看表面的現象，只會從孤立的觀點去看待事物，比如說蘇聯怎麼樣怎麼樣，中國怎麼樣怎麼樣。事實上，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事物，都是跟整個世界的其他事物有關聯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跟其他的事物有相互的關係而且是有相互影響作用的。所以我們從整體的，尤其是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才能夠比較深刻地理解從蘇聯到中國的革命。也就是說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研究任何一個歷史事物，都要從歷史的縱深，看看它發生的歷史條件是什麼。還要從橫面看，它跟其他的國家、其他的社會之間產生什麼樣的相互影響。它的發展、它的變化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裡，又是怎麼產生的。

這是我談社會主義歷史的思考方法、出發點。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蘇聯的十月革命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大家如果讀過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話，都知道馬克思原來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產生的條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生產豐富，但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激化，越來越多人成為被剝削、被壓榨、生存受到威脅的無產階級，成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力量。但是，在社會主義運動第一個革命成功的國家，也就是俄國，卻是一個相對於歐洲資本主義強國經濟比較落後、還未工業化、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形態。它一開始發生的歷史條件跟原來馬克思主義理論裡面所提的——認為會在西歐這些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地方首先產生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同的。

再者，馬克思主義理論講到，社會主義革命要能夠成功、能夠持續穩固存在的話，不能僅僅在一個國家裡產生，它要是一個世界革命，要成為一個普遍的、世界的現象。如果單單只有一個或少數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話，它就要面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強國的威脅，就抵擋不住這些



airiti

資本主義強國處心積慮的顛覆也好，侵略也好，想要撲滅社會主義力量的企圖。從這樣來看蘇聯，你就會知道它從革命成功以後一直到它後來崩潰的過程中所碰到的重要難題在哪裡。比如說當俄國在一個經濟相對於歐洲落後許多，是一個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多數人民又是文盲的很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利用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矛盾最脆弱的環節」，在帝國主義之間為了爭奪世界市場及土地資源的占有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抓住這個機會打破這個最脆弱的環節，在俄國產生了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它馬上面臨一個問題，俄國革命成功後接下來就是三年的內戰，這個內戰不是單純的俄國內部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撲、跟俄國共產黨政權打仗而已，而是其他的資本主義強國支援了俄國國內的「白色力量」，所以它們很艱苦地打了三年內戰。雖然最後打勝了，但卻是慘勝。這也類似於中國的情況，兩岸之所以分裂就是因為以美國為主的力量介入了中國內戰，一樣是要支持國民黨反共，就像當年歐美國家支持蘇聯的白軍反紅軍、反俄國的革命政權一樣。社會主義的國家剛成立，體質還很弱，它們就要把你扼殺在襁褓之中，在搖籃之中。當然最後沒有成功，在列寧領導之下還是打敗了白軍，鞏固了紅色政權。

但是接著而來，就是怎麼樣恢復經濟，怎麼樣提高蘇聯的國力，這是面臨的一個重大的問題。你必須一方面維持人民的生計，另一方面又能夠趕快加速工業化，成為一個工業國家，藉著工業化使國家的武力、人民的生活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體質能夠增強，然後不斷地發展。這樣一個任務就擺在了蘇聯面前。就在這樣一個艱困的環境之下，蘇聯一方面從事國內建設，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單獨一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你沒有全世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力量的支持，沒有讓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也跟著發生的話，一國的社會主義要長期存在是很困難的。因為你始終會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下，你就會出現生存的危機。所以它們1917年革命成功，1919年就成立了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就是專門支持全世界各國的革命，由各國的共產黨成為它的組成分子，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是它的支部，形成世界性社會主義力量的集合，然後由蘇聯共產

airiti

黨當頭，總部設在莫斯科，由他們指揮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

另外一方面，列寧非常深刻地思考到，不僅僅要支持社會主義運動，由於帝國主義的發展與經濟利益，不光是靠著剝削本國的勞工，它還透過占有殖民地、控制半殖民地來掠奪這些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資源、勞動力以及市場，用這種方式來厚植它們的經濟力量，從世界各個被控制、支配的國家榨取資源跟利潤來增強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所以列寧、史達林就提出「不要忘記東方」，也就是不要忘記東方這些被殖民的小國、弱國。他們認為東方的這些弱小民族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後備資源，你要斬斷它跟這些後備資源的聯繫，讓被殖民的國家能夠獨立，得到民族的解放後就切斷了帝國主義國家掠奪這些弱小國家的管道，就能大大地削弱帝國主義的力量。所以他們也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會有蘇聯支持國民黨跟共產黨聯合的國民革命，才有孫中山的所謂「聯俄聯共」的政策，中共整體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員，然後才有北伐，有了北伐之後才有國民政府，才有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控制了中國。當然後來國共分裂我們就不細講，但總之我們要理解在世界歷史的脈絡裡，包括中國在內的歷史的發展變化，這樣才能看得懂、看得透。你孤立地來看中國本身的現代史是看不清楚的。也就是在第三國際的支持之下，黃埔軍校建立，從教官到武器彈藥、經費，大都是由莫斯科第三國際那邊供應的。所以想想在蘇聯本身基礎還沒有打得很穩的基礎上，還要兼顧國內外，要對全世界的革命運動都予以支持當然是非常吃力的。

在非常吃力的時候怎麼辦？它用什麼方法使自己經濟實力強大呢？農業國家轉化為工業國家的一個共通點就是，你的基礎既然是農業經濟，你就只能從農業和農民身上去取得你工業發展的資源（從食品、原料到資金）與市場，這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蘇聯共產黨用計畫經濟的模式制定經濟計畫之後分配全國的資源，依據發展的重心來配置從資金到技術到人員等方方面面的必要的東西來發展經濟。初期就是強調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根據政治經濟學理論，消費品部門跟生產資料部門之間的比例分

airiti

配的問題，這個我們就不談了……總之呢，它就是以發展重工業為重心，因此不免就對農業方面包括輕工業方面的發展比較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產品剛好跟民生是有關的，在這一部分，中共因為跟蘇聯無論是在理論思想上，或者是在革命成功後的現實條件下都有類似的地方，所以就有類似的發展模式。但是相對來說，中共又更重視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相對平衡。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裡面談到，重、輕、農的比例關係，但是雖然有這個認知，還是不免更側重在重工業上面，因為一方面首先要把國防工業建立起來，你才能自衛自保，就像北朝鮮現在全力發展核武一樣，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能自保以不被帝國主義消滅、侵略，你才可能立足，才能談到進一步的其他發展。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它的發展戰略就是先建立重工業，把國防工業以及礦業、冶金業、機器製造業等基本工業先建立好、打好基礎。這樣一來相對地在民生方面就往往不能夠很好地兼顧，也就是在積累與消費的關係上，側重在積累方面。一般喜歡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喜歡拿發達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去比，說從蘇聯時期一直到中國大陸毛澤東時期比較貧困啊物資不足啊種種……，用這種方式去對比然後就說，還是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就是貧困，民生日用就是不足。但是大家往往沒有注意到一點，蘇聯垮台之後，今天的俄羅斯，事實上它已經淪為二流國家了，但注意看它在重工業特別在國防工業上，在世界上仍然是名列前茅的，就因為前蘇聯留下來非常強大的基礎，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它在一般的工業上事實上已經淪為二、三流的國家，它今天的主要出口，就是石油、天然氣這些燃料或者其他原料。這是經濟不發達國家的特徵。它原來是一個跟美國號稱「兩霸」的超級強國，淪落到這樣一個地步，搞了資本主義之後，蘇聯解體，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崩潰之後，今天的局面反而更糟而不是更好。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再來談中國大陸，這三十幾年來，經濟高速發展，我請問你，它們是憑空而來的嗎？它如果沒有在毛澤東時期打下來的那麼鞏固的從國防、重工業到輕工業等方面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話，它憑什麼平步青雲？所以一方面，大陸在毛澤東時期相對來說民生的消費是比較低的，但是它在比如說太空，



我們知道大陸的衛星一九七〇年代就已經打上去了，一路能維持到現在，它能夠跟美俄鼎足而三，都是由於毛澤東時期打下來的基礎。它也早就是核子大國了，其他的包括生物科技方面都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就有了長足的發展。所以它「走資」以後，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就是原來經濟落後的國家裡是獨一無二的，它的基礎、它的條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就是因為在毛澤東時期經過三十年的努力，艱苦奮鬥而來的。而且我們要注意到，在中國大陸來說，它的條件比蘇聯還糟，因為它同時面對著美蘇兩霸。一九六〇年代之後，中蘇決裂，關係日漸惡化，蘇聯不但切斷了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援助，還在全世界各地跟中國作對，雙方在中蘇邊境上陳兵百萬，最有名的珍寶島事件，1969年差點打起來。所以在大陸來說它的條件是比蘇聯當年面臨的更糟，更嚴峻的局面。但是即使在這個情況之下，大陸無論是從經濟增長，人民生活各方面，都還是逐步在改善中，在提高中。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了解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以及前蘇聯、中共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比較差的歷史條件下，它們必須要採取的一些比較特殊，不同於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方式。只有在這樣一個強調計畫、強調調動全國資源統一分配使用的體制之下，國家才能夠取得高速的發展。大家有可能不知道的是，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快的，蘇聯從1917年建立政權到1936年左右，它就已經工業化了，短短二十年左右。這是經濟學者客觀研究各國的經濟發展史後得出來的結論，就是蘇聯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然後你們看看蘇聯，到一九八〇年代，戈巴契夫上台實行改革，蘇聯當時無論是在科技上，在教育水平上，到人均壽命，到經濟發展速度，都已經跟歐美國家相差無幾，增長大幅提高，雖然它整體速度緩下來了，也碰上了增長的瓶頸，但是經過六十年的努力，它快速從一個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小農國家在幾十年內迅速趕上，成為與美國爭雄的兩大強國之一。等到戈巴契夫之流的以及後來更糟糕的葉利欽上台後，徹底「走資」，資本主義化之後，整個俄國一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到了崩潰邊緣，物價高度上漲，商品短缺，匯率貶值等種種問題叢生，1998年的金融危機更是嚴重，所以整個資本主義化以後，跟原來西方右派所說的，你只

要搞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後你的經濟就能好轉、人民生活能夠大幅提高等等完全背道而馳。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右派們、政客們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們的論調根本是胡扯，根本是故意要欺騙蘇聯上層的當權者。我這麼說不是主觀論斷，是有客觀證據的。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讀一下美國麻薩諸塞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David Kotz)和一位派駐莫斯科多年的記者一起合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sup>1</sup>(其實應該叫「來自上層的反革命」)。蘇聯怎麼從計畫經濟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蘇聯體制怎麼崩潰的？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請問蘇聯崩潰是它經濟真的出現危機然後民不聊生民眾起來革命嗎？不是吧，沒有這個問題吧。它反而是因上層主導的體制改革而崩潰的，上層的統治集團在整個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大撈特撈，把國有資產私有化之後，中飽私囊。跟西方資產階級合作，用各種手段，化公為私，最後再占有資本主義化之後的所有政治經濟部門，手握政治經濟大權。這還包括了西方對俄羅斯領導階層的欺騙，俄羅斯接受美國資產階級學者所提的經濟變革方案，搞所謂「shock therapy」(休克療法)的時候，西方的統治階級曾經答應說，你們只要搞這種激進的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改革，我們願意提供你幾十億美元幫助你穩住經濟，因為所謂「休克療法」在短期內徹底劇烈地改變經濟體制會馬上造成經濟的衰退和對人民生活的嚴重影響，必須要有相當多資金的注入才能維持經濟的穩定，結果後來西方根本沒有依照承諾挹注資金，挽救俄羅斯崩潰的經濟，根本就是場騙局。所以一直到現在普京他們為什麼這麼痛恨歐美國家？「因為我們就上你們當，被你們耍啦！」本來葉利欽之流親美親得不得了，普京之前俄羅斯的領導層都是親西方派……。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我沒辦法再繼續講，也許明天或者最後你們提問時，我再繼續談。接下來我們請陳信行來談他要講的主題。

---

1 David Kotz and Fred Weir. 1997.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中文版：大衛·科茲(2002)《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曹榮湘、孟鳴歧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從十月革命之前的左翼運動看革命的 歷史意義

大家好，我是世新社發所陳信行。我今天想要談的題目，大約我們也可以把它說成是「如果沒有蘇聯革命的話，會怎樣」。我會先談一下我們現在在台灣實際的社會運動面臨的一再重複的困局，這個困局有非常多的歷史先例。再來我會談一下十月革命以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裡面的兩條路線的爭論，這兩條路線後來一條成為蘇聯所代表的革命的路線，另外一條成為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的改良的路線。我會談一下這個分歧在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裡面所出現的後果。之後我會談一下在戰後，當冷戰開始、兩陣營對峙



airiti

的時候，西方各國經濟上的階級妥協體制。之後我談一下在戰後民族解放運動裡面新獨立的國家所採行的發展策略，如何地是跟前面的這一系列的爭論連在一起。最後談一下整個所謂經濟妥協體制在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的崩潰以至於成為現在的這個模樣。第一個，我們現在的運動面臨什麼困局。早上去一個紀念二林蔗農事件的研討會。1925年，台灣農民第一次以合法鬥爭公開反抗日本殖民當局，被逮捕、被鎮壓。二林事件當時的領導者李應章，後來成為中共黨員，那一代的台灣的抗日運動者跟共產主義運動走到一起，在當時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倒不是想講二林事件，而是我在現場遇到了詹順貴。在第三次二林事件，也就是2008年到2009年二林相思寮的土地要被強制徵收來建中科(中部科學園區)四期的時候，詹順貴是幫農民打官司的非常重要的律師，他也是我的鄰居，現在當上了環保署副署長，帶著他的朋友們的滿心憂慮和表面上的祝福進去官府裡面。見了面，大家應該都能想像得出來，他就滿臉苦笑。我本來想問他的話，都不忍心講。

詹順貴在環保署副署長的職位上必須解決一個很多人都面臨的切身的問題，就是台灣尤其是中、南部嚴重的空氣汙染問題。而這嚴重的空氣汙染問題也不是大家少騎摩托車就能解決的，事實上就是幾個重要的工業大汙染源的問題。道理大家都知道。解決的方式呢？我們不能只靠政府去做，要發動公民的力量起來，大家都同意。這樣一個人進到政府單位裡面，掌有一個政府部會的權力，能做什麼呢？我也不是說他沒做什麼，或沒試圖做什麼，但這種人在這樣子的位置到後來……我想大家應該經歷過太多，知道說我們恐怕不應該期待太多。這不是個人的問題，也不只是認識高低的問題，而是這個政府本身恐怕就不是用來做社會改革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另外一方面，在社會改革方面，在場也有很多人參與了這兩年，砍七天假，「一例一休」這個勞動基本法修法爭議。2015年在競選的時候，蔡英文對坐在現場後面的毛振飛等工運人士提出的訴求，她都說好。她答應上台會給我們週工時降到四十小時，我們終於可以落實八小時工作日了。八小時工作日，順帶一提，這個是一八七〇年代工人運動就開始爭取的東西。但是，到了2017年，我們眼看著實施八小時工作日的希望又要被剝奪了。工時問題

airiti

大家也知道後來是怎麼樣的發展，蔡英文上台之後就馬上反悔了。今年所謂「一例一休」開始實行的時候，整個資產階級的媒體只要逮到機會就說任何問題都是「一例一休」害的。然後現在重啟的勞基法修法，儼然就是要把2015、2016年中工人所爭取到的進步剝奪掉、還給資本家。

這是不只是台灣政府有這個問題，也不只是改革這個或那個局部的問題。因為在台北這裡，幾十萬人包圍總統府也不是一次、兩次的事情，好像兩次、三次了吧。從反扁紅衫軍到2014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想過這個問題，當我們發動幾十萬人包圍總統府的時候，怎麼沒有人要想到衝進去，把現任總統揪下來，說我們就換個政府了，宣布成立臨時政府，管你叫什麼名號。你也可以不牽扯到統獨問題，完全可以想到一個完全不會冒犯北京的名號。好幾次有這樣的機會，但完全沒有人認為這會是一件有意思、可以做的事情，因為你都知道不管是誰去把這個政府攬下來，你所能做的都是有限的。所有的改革主張碰到「國際競爭力」這回事，通通要妥協。這個是我們現在運動的困局，不只在台灣這樣，在美國，在歐洲，在你可以想到的任何國家，都是這樣子的困局。有些地方這樣的困局也許比較輕一點，有些地方比較嚴重、比較尖銳，但是基本上這是一個共同的狀況。

在十月革命以前，當然就存在著試圖、主張要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個新社會的力量，即當時所謂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國際。當時很重要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圍繞著一系列的課題，包括我們現在討論這些課題，我覺得還是重要的。

辯論的一方是德國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當時的德國社會黨裡面的右派。他的主張是這樣子的：基本上社會主義者可以在不發動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之下，和平地消滅資本主義。什麼是和平消滅資本主義？比如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無秩序、無政府的狀態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消費不足，從而造成經濟大蕭條，這個東西可以透過國家調控來解決。那麼如何透過國家調控呢？他認為德國當時的狀態非常好，因為當時德國的工業越來越壟斷，壟斷到一個地步，國家就把它接手過來，不就是完成了國家調控嗎？這問題就可以圓滿地解決了。



airiti

另外呢，當時的一個爭議是帝國主義問題。德國當時跟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在對外擴張。具體上，爭議最大的計畫，就是當時德國要租借中國的青島、膠州灣，然後把山東納為德國的勢力範圍。這個計畫德國人要不要贊成？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要不要贊成？伯恩斯坦認為該支持。為什麼？因為先進的歐洲有先進的生產力、文明的各種文化乃至民主政治。雖然當時的德國算不算民主還有爭議的餘地，但是至少好過中國的大清帝國吧。他認為這些文明的東西可以透過殖民主義來教化我們這些落後的地區、落後的國家、落後的民族，讓我們進入文明的社會。當時爭議裡常常被拿出來的例子，是印度的種姓制度。有這麼嚴苛的階級壓迫的地方，被人殖民，似乎只有好沒有壞。即使殖民有壞的一面，可能也是必要代價。

伯恩斯坦另外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現在很多人也主張的——新科技的飛躍已經解決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當時的新科技就是電報和輪船。電報已經施行了全球的一體化。印度發生的事情，一打電報，幾乎同一時間倫敦可以知道。所以，不需要等九〇年代網際網路的出現什麼的，電報技術就已經把全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先進的通訊與運輸技術等等，都可以讓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順利解決。

我們事後看來，當然這些東西每一點都有問題。當時的重要反對者包括在伯恩斯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裡面的論敵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以及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裡的列寧等等的。他們都認為必須要砸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讓工人階級真正地掌握政治權力，然後用這個國家機器來改造社會、改造經濟。當然問題就是說，所謂「砸毀」，我們被選舉上去算不算？並沒有人排除這回事。還沒「砸毀」之前我們要不要一些改良措施？譬如說我們要不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那當然要爭取，沒有人反對這些東西。兩邊爭論的只是說，社會民主黨需要發動一個徹底的改變，還是通過局部一點一點的改變可以逐步掌握社會政治權力。十月革命之前這場論戰就已經把國際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右派和中派在1914年8月，違反社會主義國際向來的共識、在各國的議會投票贊成各國政府的戰爭撥款、直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打背書。這個大戰後來被證明是個無原則、無意義的大屠殺。

airiti  
社會主義國際的右派和中派也因此蒙受了政治信譽上的重大打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成立了，變成了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列寧甚至在1920年的時候，還認為下一個應該是德國要革命了，德國的革命肯定比俄羅斯的要先進，俄羅斯還必須向人學習，哪知道後來七十年俄羅斯會變成社會主義陣營裡面的老大哥。當時反對蘇聯這個路線的在西方包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地原來的社會民主黨中、右派。他們就漸漸地成為所謂的修正社會主義者。他們黨綱裡面都還是主張消滅資本主義的，只是這個消滅是比較長時期的過程，甚至非常像習大大說的「我們還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需要很久之後才能達到」……但至少在黨綱上，資本主義是要消滅的。之後，這個主張變成「資本主義是可以修正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做了這個那個修正，它的重要矛盾就可以解決。

到了1929年股市崩潰、經濟大蕭條，衝擊到各個國家——包括日本，也包括日本殖民下的台灣——的時候，這如何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變得非常的急迫。大量的企業倒閉關廠、生產力被廢棄，大量的有勞動能力的工人失業，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那個時候從所謂「修正資本主義」的陣營出現了兩種做法。一種做法以美國的「新政」為代表，基本上是左派跟比較開明的民主黨合作，興辦國營事業，包括當時有名的田納西河谷計畫等等的。國民黨孫運璿等第一代技術官僚就是在田納西河谷計畫受到訓練的。另外一邊就是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德國納粹黨在內的法西斯主義，由一個以軍國主義為核心的所謂開明的專制力量統合成市場上勞資各方的力量。後來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被消滅了，所以只剩下類似美國式的這種改良措施。

到了戰後，1945年德國被打敗之後，美國和蘇聯的對峙和冷戰幾乎是第一時刻就馬上開始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陣營裡面建立的一個體制，我們可以說大約是長達二十幾年左右的階級妥協。在這個階級妥協體制裡面，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把交通事業、電信、電力、重工業、金融等各種關鍵產業國營化，美國是少數的例外，但也對這些產業高度管制。在歐洲，關鍵產業國營化幾乎是通例，日本也是這樣子，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

在這二十幾年裡，每一個國家如果它財政可以負擔的話，它都提供免費

airiti

的教育，廉價或免費的住房，公辦的醫療、托育、養老等等公共消費，這些也就是現在我們所有領薪水的勞苦大眾最傷腦筋的花費。但是在那幾十年裡面，西方國家的主流政治主張認為這些應該是國家的責任。

同時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等等紛紛試圖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它們建國的模型基本上也是模仿蘇聯，或修正版的蘇聯模式，就是剛剛說的社會民主模式，包括國營的交通、電信建設、重工業建設等等。然後試圖建立免費教育（至少國民教育，高等教育如果能辦的話也基本上是免費的）。至於住房問題國家是不是能夠解決，是不是能夠施行公辦的醫療等等？這些東西在戰後新獨立國家民族工業化的旗幟之下，都被認為，也許現在國家沒有能力，但是未來有能力了就會來辦的。這些國家包括印度。印度在它獨立的前幾十年裡面還自稱是社會主義的。現在印度憲法裡，「社會主義」的字眼還在。<sup>1</sup> 甚至一九七〇年代從巴基斯坦獨立出來的孟加拉，建國口號之一也是「社會主義」，雖然孟加拉實在很難算得上社會主義國家。

但這些重要的消費事項的公共化，事實上是西方國家針對蘇聯的挑戰的一個階級妥協版本。而這個階級妥協版本也變成正試圖建立自己國家的戰後新獨立國家的模型。這個模型的關鍵在於，在這個國家裡面的資產階級願意跟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妥協。那它為什麼要妥協？等到這個階級妥協制度開始崩潰的時候，道理才變得非常清楚。當年是因為蘇聯的存在，才使得這些國家的工人、工會、工黨可以選擇跟資產階級達成妥協。

像我們剛剛講的，重大家庭開支、公共消費通通由國家對資本家徵高稅率來興辦，工人暫時不愁，也就不需要革命了。要不然，這個那個條件不好的話，工人開始不滿了，工人隨時可以革命。革命是怎麼回事呢？在蘇聯存在時，所謂革命往往也就是倒向蘇聯。當時蘇聯還在的時候，在西方，比如

---

1 印度憲法前言第一句：「印度人民謹誓建立印度成為主權獨立、社會主義、世俗、民主共和國……」(WE, THE PEOPLE OF INDIA, having solemnly resolved to constitute India into a SOVEREIGN, SOCIALIST, SECULAR, DEMOCRATIC, REPUBLIC……)

說西德，旁邊就是東德，完全是可以互相比較的。所以美國政府花了大筆的錢，把西德建得富麗堂皇，就是為了要跟東德比較，看哪一邊生活狀況比較好。像南韓和北韓等等，你完全可以比較。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北韓人的生活是比南韓人要穩定、要好的。

這個階級妥協當然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就開始崩潰，這與蘇聯的崩潰不完全是直接的關係。其中包括說第三世界的債信危機。當時的新興工業國家，特別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這些國家的債信開始崩潰，跟蘇聯的經濟危機是間接的關係。<sup>2</sup> 蘇聯本身在此之後也出現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而開始走向改革開放。中國也走向改革開放，跟美國停止對峙關係。這個時候，英國和美國的執政者就開始放膽地把這些階級妥協政策一項一項地取消掉了。

到現在，英國也許稍微好一點點。但是，沒有為房貸操心的人，幾乎是沒有的；沒有為子女教育費操心的人，幾乎是沒有的。就醫療來說，英國的或許也還好，因為公醫制還沒有被消滅。但是在美國，沒有為了醫療花費而操心的人，幾乎是沒有的。每個國家階級妥協體制崩潰的程度不同。在歐洲有些國家還維持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免費，但是在越來越多國家裡面，教育、醫療、住房這些東西，都漸漸地變成「產業」，變成是發財的管道，而不是國家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

這些東西真的是等到蘇聯「沒了」，蘇聯威脅的這一個局勢完全解除之後，你才可以看到西方社會民主黨在將近一百年前不走蘇聯的路，走自己的所謂「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乃至「和平地修正資本主義」的道路，到後來是一場空。因為那條道路之所以可以有進步，之所以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確實是統治階級怕你跟著蘇聯跑。當蘇聯結束的時候，這些東西也就沒有了，也就進入了我們所謂的全球化的時代。

到現在我們幾乎每個國家都面臨這個狀況：你勞動人民當然可以抗爭，你可以要求，你可以立法，你可以選新的黨上去。但只要在現行的政治體制

---

2 1973-1974年蘇聯小麥歉收、大量進口小麥，造成國際糧價高漲，這與石油危機同時是觸發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第三世界債信危機的導火線。

airiti

裡，一旦到後來資本案說「那我要出走了」，你所有的這些改良措施都必須要往後退。你不往後退，大家就沒飯吃。

所以，這個狀況不得不讓我們再回來問一個問題，到底值不值得讓勞動大眾把國家再「拿下來」？如果是以詹順貴當副署長這種方式當然不叫作「拿下來」，這個只是試圖參與而已。如果只是把某某人選上去，這個也不叫「拿下來」。但是，如果真的能夠改造這個國家機器、讓這個國家機器真的是在人民大眾的監督之下來做事，是真實的監督，而不僅僅是一小撮人以人民的名義來做，這件事情究竟是否值得追求？

蘇聯倒台的1990年前後一直到現在，我想絕大多數西方各式各樣的先進理論都說，不值得！國家也許根本不重要，國家也許只是一場夢幻，國家也許要在全球化裡面消失了，等等。有時候我覺得這種說法也許更多成分是為了要安慰自己，因為我們發現不管我們送誰進政府裡都沒用，不管怎麼修法都沒用。所以不如相信說，好吧，事情就是這樣子了，那我們就一輩子這樣吧，一代一代這樣下去。

要不然我們就必須回頭去好好看看當年蘇聯走的那一條路。的確，七十年後是失敗的，但是那一條路到底內容是什麼？那條路如果要在我們的未來繼續走的話，要怎麼走下去？當然包括那條路裡面的錯誤，如果我們不能清楚地認識那裡面到底出了什麼錯的話，我們現在再試圖走的話，還是會犯類似的錯誤。

從我們現實的困境裡面，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回去紀念蘇聯革命，不只是因為它有歷史上的重要性，有一種迷人的魅力什麼的，而是它跟我們非常迫切的問題是連在一起的。謝謝！



## 民主還是財主？

結構私有制民主與文革之異同

大家好，我今天談一個主題，我也不知道談什麼主題比較好，我想了半天，想到一個主題叫「民主還是財主？——私有制下的民主和文革的異同」。我準備講幾個內容，首先我得介紹一下自己。然後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防備革命者成為新的土皇帝，這是接著剛才陳信行老師的話題。因為十月革命對歷史改變、對老百姓的生活改變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光是在本土而且是在全世界，就是剛才陳老師講的東西，但是最後失敗了。中國的革命受世界革命的影響，最後也失敗了。所以我們要總結的問題就是怎麼去防備革命者成為新的統治者，這個能不能簡單地通過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探討民主這個範疇到底是什麼，從經濟領域看民主範疇的意義，然後談談專政和民主的關係，從這兒去理解、研究文革是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最後做一些總結。看來這個主題可能完成不了，我只能很快地講講。

講我自己呢，我父母要到中國去是二戰以後了，我爸爸是養牛的，我媽媽是搞原子彈的。我是在中國出生的，然後文革串聯過，也見過周恩來，之後在中國當工人，在美國當工人。我1974年去的美國，在毛澤東時代接受的是馬列主義，到了美國全部是強大的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尤其是到1989年，陷入了「信仰危機的深淵」。所以我們現在看歷史百年來，十月革命百年了，但是十月革命以後世界的所有共產主義運動後的執政黨都走到了它的反面，成為資本的代表。怎麼防備革命者成為新的土皇帝，這不光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問題。我在美國當工人，參加工人運動，就覺得理不直氣不壯，你是主張把蛋糕分大點呢？還是把蛋糕奪回來？這是改良和革命的

airiti

差別。但是人們就會拿蘇聯和中國說，你們這些激進分子，就想利用我們上台，以後照樣壓迫我們。所以怎麼去回答這個問題，人們有時候就會說學美國有民主即可，但簡單地通過民主是否能夠防備走資派上台？所以這裡面需要研究的就是民主的範疇到底是什麼，這裡面往往存在著非常糊塗的概念。

我覺得我們要分析的，一個是私生活，一個是政治。私人生活肯定不是民主的範疇，對吧。比如，我要找對象，我要找誰，不是大家通過選票決定的；我要吃豆腐，「不行你必須吃肉」，這個東西是個人生活。那麼政府的行為當然肯定被認為民主的範疇，除非你是封建勢力，那這些就應該屬於皇家。但是在經濟領域、生產領域，屬不屬於民主的範疇？我很好奇，大家認為屬不屬於？大家想過沒想過，經濟領域屬於不屬於民主的範疇？認為屬於的舉手……認為不屬於的舉手……沒舉手的舉手……好了看來大家覺得都屬於。那我再問，如果你中了彩票，得了幾百萬美元，你自己開了廠，你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那麼假設，如果是一般人自己花錢搞的企業，他要不要民主？他肯定不要，對吧。所以經濟領域屬於不屬於民主的範疇，就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觀和資本主義民主觀的區別，也是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區別。那麼專政是什麼，聽起來還挺恐怖的，但是我問你哈……等會兒我跳了話題了……咱們回頭來看看民主，有下面這樣一個故事。過節了，廚師把雞啊、鴨啊、魚啊、羊啊全召集在一起，說：「今天咱們充分地發揮民主，看怎麼樣宰你最幸福。」那些動物們都不說話，最後廚師說：「咱們要暢所欲言麼不要怕。」然後牛就說了：「我們都不要被吃掉。」廚師又說：「你看一開口就跑題了，今天的話題是如何宰你最幸福。」

所以說，什麼決定民主的範疇就決定了民主的內涵。所以，誰說了算？在私有制下，它的本質就是，看起來一人一票，實質上它是「一元一票」。誰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大。比如說一個貧富差距非常大的拉丁美洲國家，一幫年輕人讀了些馬列，一幫「憤青」經過了努力，最後選了政客當了總統，通過一系列激進的法律把教育提高了，把最低生活水平工資提高了，把環境給治理了，把醫療什麼的都搞得好好的。錢從哪裡來？肯定不是窮人。只好是從富人那裡徵收，富人他會不高興，他們除了不講那些極端的手段，比如說

airiti

暗殺、政變、選舉前突然給你造謠或者弄什麼讓你選不上，就用最溫柔的反抗——撤資，你這兒不喜歡我，那我找到喜歡我的地方。據說有這麼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啊，街上大標語寫的是：「投資者是恩人，引資者是親人，破壞發展環境者是罪人。」所以想想，你有這些經濟政策，造成資本家撤資了，老百姓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指責撤資的資本家，一個是指責把資本家趕走的政客。在你認同私有制的情況下你會指責誰，很明顯，老百姓會說「我有錢我也走」，好像他有錢似的。他會同情撤資的，說：「你看這政策都把人趕走了，我們就失業了。」對吧，你搞環保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這裡所有制和民主的關係，咱們要講講。所有的民主都在給定的所有制下。私有制下，私人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什麼叫「神聖不可侵犯」呢？毋庸置疑，不講道理，它用警察和軍隊去捍衛。這裡面財產的屬性從來不是民主決定的。土地、廠房、企業，這些誰說了算，不可能是民主決定的。所以「神聖財產不可侵犯」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你要侵犯它就跟你不客氣，它派軍隊，它派警察。你要認同私有制的話，不會認為它是壓迫的，不會認為



它是專政，你會覺得它是很自然的。同樣的道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共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也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你要質疑就鎮壓你。所以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是無產階級專政，區別就在於財產是屬於個人的還是屬於大家的，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允許人民通過民主的手段把大家的變成個人的。就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允許人們通過民主手段，無論多麼民主的手段，把私人的不經過人家批准、認同，就把它變成大家的。所以，民主只能是第二位的，所有制是第一位的。有了私有制，才有資產階級民主；沒有私有制，不可能有資產階級民主。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本質上就像剛才講的，誰的錢多，那麼大家都要照顧他；有錢的人你必須要他有投資，有機會，我們才能有就業。所以看起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實際上它就是「誰的錢多，誰的話語權大」。我們在私有制下，必然是，在如何拍資本馬屁的方式方法上我們有選擇，但馬屁是拍定了的——這是資本的邏輯決定了的。所以民主和專政，它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沒有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沒有對私有制的捍衛，就不可能有資產階級「一元一票」的民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是一樣的，只是恰恰相反罷了。

那麼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防備過去的革命者變成新的土皇帝，變成走資派。所以文革要解決的問題有好幾個：怎麼在捍衛共有制的條件下發揮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熱情，這是第一條；第二條，怎麼防備不同的意見導致派仗甚至全面內戰，這裡面根本問題就是如何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也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敵我矛盾，然後是怎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到底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呢，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就是文革的一些根本東西，所以我說毛主席他們這些革命者對走資派的認識其實有四個階段。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那麼深入的、那麼廣泛的、全民投入的一個大辯論、大討論，然後這裡面出現了很多很多問題，總結這個歷史經驗將來對後人，對剛才陳老師說的那些問題，是極其重要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1949年到1956年，這個階段既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

又成全了走資派的形成。第二個階段就是從1956年到1962年，這個階段經歷了整風到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廬山會議爭論到三年困難餓死人等等。這個階段就是一步一步革命派認識到走資派的危險性。第三個階段從1962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以前，開始搞「四清」運動，把走資派作為運動重點，走資派怎麼去用形左實右的方式搗亂。第四個階段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走資派的認識是在和走資派的鬥爭中形成的、發展的、成熟的。先有事物，後有認識。在歷史上你看，馬克思提出《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他也不可能去解決工人階級如何掌握政權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資本主義在上升階段，工人階級大多數對資本主義的幻想還是比較多；再一方面，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還沒有尖銳到、達到世界大戰的地步。列寧經過長期的探索，知道了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的話，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占有絕對優勢的這麼一個階級——要占領它的話，工人階級必須擰成一股繩，在人數上才有可能戰勝資產階級。先鋒隊的理論、整個共產黨的建立，都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列寧沒有來得及去研究怎麼防備革命者成為新的大老爺，他來不及；斯大林有機會，但也錯過了機會；毛澤東就是能夠用他在將近三十年的工作裡面逐步地探索出問題。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對走資派認識的一個偉大的實踐。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大家都比較熟悉，但是我簡單說一下。第一，剛開始就是《五一六通知》，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動員令。緊跟著就是發動群眾還是鎮壓群眾，1966年的夏天鬥爭很激烈，這個過程太簡單了沒意思了，但是一講起來……咳，十年的過程，對吧。我建議大家看幾本書，對這個過程講得比較詳細。全國來講的話，有一本是講北京的，有一本是講武漢的，有一本主要是講上海的。北京的那本就是許愛晶寫的，叫《清華刪大富》（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這本書比較詳細地從刪大富本人的經歷解剖，從這裡可以看出整個北京甚至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好多內容。另一本書是王紹光寫的《超凡領袖的挫敗》（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講的是武漢的文革，從1965年到1976年，這些年裡面的整個過程和各個階段，特別精彩。我對所有這些書、作者們的評價或是認識，都是次要的，最



airiti

主要是他們把過程、歷史事實揭示出來。尤其是第三本書，關於上海的文革，是李遜寫的叫《革命造反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作者完全反對文革，甚至憎恨毛澤東，但是她把歷史過程寫得非常精彩。從這書裡面，我對張春橋、王洪文佩服得五體投地，你可以看出這些人他的出發點、他的行為、他幹了什麼東西，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看，他就是英雄。書都不是大陸出的，都是香港出的，但是網上都能搜到，可以免費下載的，這是信息時代的特徵，知識資源共享。所以總結起來文化大革命，可以這麼說，開始是如何發動群眾，後來是如何防止派仗。剛開始發動起來比較難，這裡面和早期的整風到反右的轉變有關係，然後派仗打得真是厲害，打派仗也是文化革命最後失敗的關鍵因素。我覺得要懂得文化革命的起因的話，還需要從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轉變稍微花點兒工夫。長時間來人們把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沒有看清楚，比如說三年困難為什麼餓死人，大躍進時為什麼會有浮誇風、亂吹牛，這些其實如果要刨根問底的話，咱們不光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我們現在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是什麼，資產階級掌權了，那麼我們可以追溯它的歷史，看它哪一步走錯了，它為什麼走錯了。這樣就要知道走資派怎麼產生的、發展的、壯大的到怎麼奪權的。這裡面根子要找還是要從1955年、1956年的工資改革算起，在這以前，幹部是供給制，之後供給制取消了變成了工資制，工資制呢的差別是很大的，它是從第一級到二十四級，大於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差別，那麼這些差別是不得已的。工資改革的錯誤不在於取消了供給制，供給制是不可持續的。它的錯誤在於，把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掛鉤了。你從一個縣一級的領導到省一級的領導到中央一級的領導，你的工資、待遇、家庭各方面都跟著上去；如果你被批評了、降級了、罷官了，那麼你的一切都跟著喪失，所以它客觀上是一個升官發財、罷官丟財的機制。它造成黨內鬥爭除了追求真理外，開始跟個人利益掛鉤。黨內鬥爭你要是失敗了，那麼不光是臉上不光彩，你不光是罷了官了，你的家庭就跟著要倒霉。那麼有多少個革命者，他會頂得起自己的配偶，懇求他看在孩子面上不要定罪狀？很難。所以這個工資制和升官發財、

airiti  
罷官丟財的機制，是走資派的物質基礎。

但是光這個還不夠，它的政治環境是在1957年反右形成的。1956年完成了工商業資本主義改造、農業的集體化、合作化以後，中國下一步到哪兒去？當時的矛盾產生一大片，工人有罷工的，學生有罷課的，農民有鬧事的，國外有匈牙利事件、波蘭事件、赫魯曉夫的二十大秘密報告……怎麼去處理這些矛盾，黨內當時就有兩個非常相反的方法，一個是鎮壓，一個是找矛盾根子。毛澤東的主張就是要通過整風批判，批評那些官僚主義者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整風從1956年到1957年，頂峰就是1957年的5月14號，14號早上毛澤東還給中央的領導批一大批材料說，你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14號晚上，政治局開了兩天擴大會議，來了一百八十度急轉彎：整風停止，開始反右。毛澤東傳說沒有紀錄，我不相信，從毛澤東的表示裡看，他緊張得是一個禮拜沒下床，天天看材料，他以為自己惹禍了、誤斷了，他以為共產黨的政權要被右派給顛覆了，一個禮拜以後緩過勁兒來，發現右派沒那麼強，估計全國四、五千，北京幾百個，後來鄧小平定的是五十五萬。現在回過頭來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所謂右派是革命者。凡是當時給當地官僚主義者提意見的、提問題的，通通打成右派。這就有了反右，從那以後，他向世界宣布官僚特權反不得，批評意見提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反右和整風，它的方針路線政策是截然相反的。整風的矛頭是向上，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路線是發動群眾、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右的方針是矛頭向下、向外，路線是運動群眾，不是與群眾運動。怎麼運動群眾呢？領導布置誰當右派，就鼓動大家去寫，這叫運動群眾。政策就是文字獄，無限上綱，抓辮子、打棍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1957年到毛澤東去世，反右和整風的兩種方針路線政策之間的鬥爭貫徹整個二十來年。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整風的繼續，是整風方針路線政策的繼續，但是黨內走資派總要把它變成反右的方針路線政策的繼續。他們在文革的開始的五十天裡面想把文化大革命變成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被否定以後，他們又用各種辦法去攪局。鄧小平掌權以後，1989年他利用一些右派群眾、學生的親西化作為藉口鎮壓人民。所以這些人幾十年都是一脈相承的。我們有了這些完整的走資派的標

本，那麼今天我們再回頭看問題就比較清楚。

最後總結一部分，就是十月革命以後，工人階級如何掌權的問題，這裡面有些客觀規律，我總結出這麼幾條，不知道合適不合適。一個是我們要區分什麼是道路之爭，什麼是路線鬥爭。道路之爭就是到底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路線鬥爭就是怎麼去實行社會主義。所以道路之爭是大方向的爭論，路線鬥爭是方法的鬥爭。路線鬥爭是人民內部矛盾，是革命者就怎麼進行革命的方式方法的爭論。道路之爭是到底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敵我矛盾，它是不可調和的。但是有一點，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道路之爭是被路線鬥爭掩蓋的。那些黨內走資派他們從五〇年代開始反對合作化，大躍進裡搞浮誇風、共產風，三年困難餓死人又走到單幹風，他們整個一條路剛開始看好像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hindsight（後見之明）——現在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幫人就是不要走社會主義的。但當時看，他們不會說：「我不要走社會主義。」所以在路線之爭掩蓋下的道路鬥爭是貫穿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拿一個故事來形容吧，長征路上有一個北上還是南下的鬥爭，如果我們把北上還是南下作為大方向的爭論，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話，北上道路是千千萬萬，一會兒一座大山，左繞右繞直接過去，但這只是一個時間長短的問題，是一個成本的問題，其中當然有些教條主義者遇到一大堵牆，他一點兒都不知道要繞，就要在這牆裡面不過去，那就永遠過不去了。但是要南下的人呢，他總是找藉口，可以往北上了，他還是要繼續繞、繼續繞。所以這裡面剛開始特別難區分到底是路線鬥爭還是道路之爭。

最後一點，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怎麼去處理路線鬥爭，也就是怎麼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到底是用整風的方針路線政策，還是用反右的方針路線政策。文化大革命最後失敗就是成了一個派系鬥爭，派系鬥爭就是不知道用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它把對立面、不同意見當成敵人。所以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後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走資派了，他們老早就開始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而革命者開始沒有認識到這個，等到革命者認識到走資派問題的時候他們已經非常強大了。但是，十年的工

夫沒有能轉變最後的結局，還是因為工人階級的不成熟。走資派裡邊大部分可以說是不自覺的走資派，他不是主觀上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是對官僚特權內心裡面喜歡，對群眾監督比較抵觸，這種屬於不自覺的走資派。所以他們頑強地拒絕世界觀的改造，這是一方面。他們的派性最嚴重，因為他們有權。再一個大的派性的根子就是保皇派，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工人群眾、城市學生的保皇派，最主要是工人。保皇派的群眾不惜動用武力去鎮壓敢對領導提意見的造反派，直接葬送了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你不允許人家提意見，你有意見的時候也提不了了。最後是造反派本身的派性。這個不光反映在清華的百日大戰裡邊，還有武漢的造反派受打壓的時候團結到一起來，一起掌權後就互相拆台，這裡邊對比武漢和上海特別有價值，但今天沒有時間了。最後我就講一句，十月革命所代表的工人階級改造世界革命，它是一個雙重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要改造世界，也必須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任務離不開自己的先鋒隊衝鋒陷陣，但改造自己的任務首先是先鋒隊自身的改造，文革的目的不是要打倒這些人而是要教育這些人。但是他們頑強地抵觸、抵抗這種教育和改變，也是文化革命最難的地方。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區分你是真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資派會說「我是走資派，向我開砲」。我們至今沒有一種技術能將人的思想完整無誤地揭示出來，真假很難分；而且，人的思想總是在改變的，所以怎麼去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是最艱難的。好，就講這麼多。

## 改造資本主義還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各位，很高興見到大家，在座的有不少老朋友，更有面孔生疏的新朋友。我敬佩已久的作家曹征路也在座，希望他等一下可以跟我們講幾句話。

我想我還是順著前面大家講的、提的這些東西講下去。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前，想要改革資本主義的鬥爭努力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俄國革命後又是一百年，一共就是兩百年了。到底我們能拿資本主義到底怎麼辦？改革還是革命？在座各位很多人都參與了台灣的運動，我想我可以假設你們對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喜歡，總是希望能夠對它有所改變，或者是用運動的方法，通過大家組織去抗爭，然後引起可能在政府裡面制定新的法律，讓情況有所改變。我今天想講的就是，你到底是要改造資本主義還是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能不能改造，怎麼樣改造，這樣的一些問題。

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之後，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領導中國革命，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我想用我比較熟悉的美國做例子來說明一些問題，因為我在美國生活快六十年了，所以對美國的情況還是稍微了解一些。

這裡先說明一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含義是什麼？是不是成立政黨后就要馬上進行武裝鬥爭，以便奪取政權？一個革命政黨是否可以在體制內進行政治鬥爭、思想鬥爭，但是目的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我認為不但可以，而且是必要的。一個革命政黨在體制內進行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它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改造資本主義，而是在這樣鬥爭中，批判資本主義和宣傳社會主義，更是要在鬥爭中教育群眾和組織群眾，也只有這樣參與實際鬥爭才能在實踐中找到革命的道路。



airiti

俄國革命之後兩年，即1919年美國共產黨成立。這個革命政黨在成立時就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的，在要革命的前提下，它對資本主義卻做了非常大的「改造」。這裡講一下美國共產黨對美國工人運動所產生的積極的作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發生經濟大恐慌，總統羅斯福在國會通過《國家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of 1935)，准許工人組織工會和罷工。然而在法律允許罷工，和實際上組織工人和發動罷工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工人成立了工會，但如果資方拒絕與工會進行協商，那麼成立了工會也沒有用。在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36至1937年間在密西根州的弗林特城(Flint)的通用汽車公司的工廠內，美國共產黨領導工人罷工。共產黨在這個廠子裡組織工人已經相當的成功，培養了積極幹部，因此就選在這裡發動罷工。1936年底，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設於底特律的總部得到了在弗林特工廠工人要罷工的信息，就準備把弗林特工廠機器搬運到另一個工廠去，等機器的搬運完成了，那麼弗林特的工人罷工也就起不了作用了。工人有他們通風報信的人，當獲得這個消息後就馬上改變他們原來的計畫，他們放下工作將工廠占領，使得公司無法搬走機器，所以這次的罷工就是在歷史上有名的「占領弗林特工廠罷工」(Flint sit-down strike)。工人團結一致，占領工廠就這樣開始了。

在占領期間，工人表現的有組織、有紀律。他們建立了糾察隊維持紀律，也有工人專門管娛樂，另外有工人負責維持每日的生活，這樣的鬥爭就是由工人中的共產黨員來策畫和執行的。在占領工廠期間內弗林特這個城的居民給予占領工廠的工人各方面的支持，包括飯館給工人送飯，還有工人的家人組織了婦女隊，當警察要衝進工廠時，婦女和小孩充前鋒來阻擋。這樣的鬥爭堅持了四十四天，在這期間資方對工人施加各種壓力，在密西根州那麼寒冷的冬天，通用公司把廠裡的暖氣給關了，但是工人沒有屈服。最後通用汽車只好同意和工人進行協商，承認汽車工會可以代表勞方與資方談判，在談判中資方同意調整工資與改善勞動環境，這次抗爭取得勝利後，美國產業工會一個個成立，這是美國共產黨在體制內參與鬥爭的其中一個實際例子，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美國共產黨領導的多次工人運動，都有顯著的成績。

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工會為了支持反法西斯的戰爭承諾在戰爭時期不罷工，二戰結束後，1945、1946年間，大規模的罷工開始了，1945年底二十二萬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工會會員投票以五比一的比率動過進行罷工，同時電氣工人、屠宰工人和鋼鐵工人總共有一百六十萬工人，也加入了罷工的陣營。

1946年初，煤礦工人、鐵路工人、教師、公共事業工人、市政府工人總數高達四百五十萬工人，都加入罷工，是美國歷史上罷工人數最多的一年。這樣大規模的罷工，震動了資產階級，所以他們趕快想出對策，對策就是1951《國家勞工關係法》的修正，而這個法律持續沿用到今天，這個法律的修正，嚴重的限制了美國的工會無法發展。法律裡面規定：

第一、不許共產黨在工會裡面擔任任何領導職位。每個工會的幹部，必須把個人資料交給政府進行審查，政府趁這個機會把共產黨全部趕出工會。

第二、不能有「政治原因」的罷工，也就是一個工會罷工，其他工會不能因為「政治原因」去支持。

這兩個新的條例分裂了勞工階級，縮小了工會的力量。在這之後，當一個工會因為罷工，耗費了工會的罷工基金市，罷工就難以持續，在沒有其他工會的支持下最後只好投降了。所以這對工運有非常大的損傷。在美國共產黨失去在工會的影響力下，美國資產階級分裂工人的伎倆非常成功。

以前工會有「強制入會」的規定，公司要僱工人，只能僱工會的會員，後來這個規定也解除了，不一定要加入工會才可以受僱，這對工會又是一個大的損失。之後，每個州可以通過自己的法律，公告「州內的工廠不需設立工會」。組織工會，一定得有工人繳的「工會費」，工會才有錢可以代表工人做事，但是後來工會費變成隨意可繳可不繳，這些對工會都是很大的打擊。所以到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工會工人裡面占全國工人總數的35%，已經是最強了。到今天，降到只有10%，私人企業中有工會的只有7%，所以力量非常微薄。之後的工會領導也變了質，他們和政府官員、企業老闆差不多，都是為了自己的名和利，完全沒有工人的階級意識了，工會就這樣的腐敗下去，以至於今天力量變得非常薄弱。

在五〇、六〇年代工會蓬勃的時候，工人擁有相當豐厚的工資和福利，

airiti

退休後也有很好的保障；而今天美國的工人卻為貸款、生活所逼，幾乎無法思考自己工作與生活的意義。一九八〇年代底特律城在財政非常困難的狀況下，城市內的棒球隊還要脅市政府新蓋新棒球場，如果市政府不肯，棒球隊就要脅離開。市政府不得已只好發行公債來建棒球場，新棒球場及其周邊的土地和設施都屬於棒球隊及財團，讓當地居民相當不滿。參與抗爭的民眾也意識到：資本和「官」的勾結，市長不給棒球隊蓋球場，也別想做市長了。這是資本主義的根源。

前幾年底特律整個城市破產了。我想，如果你們要了解資本主義，並且想一直追根到底地想知道資本主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話，不妨注意到下面我要講的這個故事。我有一個朋友非常喜歡棒球，底特律有個有名的老虎棒球隊，也有一個老虎棒球場，他特別喜歡那個棒球場，大概是幼年快樂的回憶。就是我剛才說的，老虎隊的新老闆跟市政府說，你不給我建一個新的棒球場，我就要搬走。底特律已經慘到這個地步了，什麼都沒有了，棒球隊再搬走的話它就更慘了。最後市政府就要給他們蓋一個很新很新的棒球場，當然用納稅人的錢建的。棒球隊的老闆也就是達美樂披薩的老闆，市政府不但建了新的棒球場，而且附近的停車的地方都被他買去了，所以個老闆賺大錢了。我那個朋友就為這事抗爭了十年，他找人對舊的老虎棒球場進行評估，結果是很安全，什麼都很好；可是，新的棒球場有特別高級的座位，一個座位可以賣很多很多錢。他就因為這個事情，了解到資本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了解到資本和官的勾結，不給蓋新的棒球館就不能做市長了，了解到市民對影響他們的事，一點決定權都沒有，所謂民主政治是個假象。

我就想到今天美國的社會實在是非常退步了，一般人的生活非常困難。我在底特律住很久，所以比較清楚底特律的情況，我教書的學校也是很小的學校，大部分學生也是很貧窮的，他們念書大部分要拿州政府的獎學金。本來那個學校是白人的私立天主教學校，在1967年時底特律和一些別的城市黑人起義，白人就搬到城外郊區了。在我教書的學校大部分是黑人，我跟他們的關係非常接近，從了解他們來了解這個美國的社會，特別是底特律的情況。我發現在五、六〇年代工會很強的時候，他們的待遇就非常好，可以

airiti

說是工人貴族。他們的工資高，休假很長，而且各種各樣的福利。一個人進去工作三十年后就可以退休了，退休以後生活也很有保障，高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險，可以享受非常好的生活。但是這些都是曇花一現，非常快地就過去了。之前黑人家庭非常穩定，他們的孩子可以按步就班地上學。在那時期之後，到了我去那兒教書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已經非常困苦了。我記得我的學生裡有幾個非常讓我懷念的，他們告訴我很多他們的故事。有一個四十多歲的黑人男生，他在汽車公司裡做金屬模粉，這個工人因為吸進很多金屬粉塵，而生病住進醫院了。他跟我講，他們那時候進工廠的時候，從沒想到要做到退休，只想做上幾年，攢點錢就退下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開始成家、買房子、支付房屋貸款，然後就只好一直做下去。做完一天工回家去就癱在沙發上，沒有辦法想我這樣過下去有沒有意義。他說：「我就很幸運，第一我沒有結婚，第二我生了這場病住在醫院裡，就有時間思考，我這一輩子不能就這樣做下去，我還有幾十年要活。」所以他就決心辭去到我們學校念幼兒教育。他上我的經濟課一直考不及格。有一次他就很氣地跑出教室，我以為他生我的氣。後來他跟我講，老師我不是生你的氣，是因為我自己太笨了，我老考不好。後來我就給他補習，一直補習到他可以通過這個課，這個人後來畢業就去做了幼稚園老師。

剛才講了半天改造資本主義基本上就是社會民主，歐洲國家好多所有曾經得到的福利最後都失去了，醫療啊、教育啊什麼的都失去了。現在好像還有幾個國家算是成功的例子，比如所謂的北歐經驗。我記得前幾年台灣常常講北歐經驗，最近幾年大陸上又在講北歐經驗。北歐這幾個國家呢，實在是有些相當大的不同。共同點是，雖然付很高的稅但有很好的福利，健康保險很好、養老也好，最低工資的規定也合理……而且它們的確是實行資本主義道路，不是什麼半社會主義道路。我就想，為什麼它們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且到今天還能保留下來。大家都說是因為它們的國家很小，像最大的瑞典有兩千萬人，跟北京市一樣多。它們又有很多資源，我想這確實是比較容易實行成功的社會民主的一個原因。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資產階級很團結，中間的矛盾比較少，像1992年瑞典經濟危機大恐慌的時候，很快地兩個

airiti

大銀行就被國家收購了。我想可能就是因為它們太小加上資產階級很團結，所以可以做到。但其他的國家，比如西歐和美國，福利是在越來越少，真的是什麼都失去了。西歐各國和美國現今福利不斷地縮減，原來有的一些福利也都消失了。這說明為了社會一般人的福利來針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最終是失敗的。

回頭來看今天美國的情況，美國共產黨在五〇年代的麥柯賽主義的政治壓迫下，力量逐漸削弱，之後，它跟著蘇聯修正主義走，毫無反省能力。在底特律這個曾經是美共勢力很強的城市，如今就只剩下幾個老人。現今美國左派運動中無政府主義占多數，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組織、反對組黨。他們認為有組織就有領導，有領導就有人有權，人有了權就一定腐敗。無政府主義者成事不足，敗事有餘。2011年赫赫有名的占領華爾街事件跟七十年前的占領弗林特工廠事件完全無法相比，因為占領華爾街的一些人什麼都沒有拿到。

我想就說到這裡吧，看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



## 10月21日現場討論

**杜繼平** | 接下來請大家提問。在四位主講人談過之後想要提出什麼問題來追問，或者對哪一部分聽得不夠清楚，都可以提出來，大家不要客氣。

**林深靖** | 我剛剛聽到陽和平的結論的最後一句，就是要如何在改造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你認為這是最困難的問題。其實我也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過去我們常常在講社會主義新人。可是又有人認為私有制的精神才好，因為符合人性，所以它能夠成功。要改變私有制就是要創造社會主義新人，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問題是創造社會主義新人，有人又認為它違背人性，當然我們都知道老馬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裡的講法，就是哲學、普遍的思考不僅是要解釋世界，而且要改變世界。陽和平說呢，改變世界的同時先要改造自己。怎麼改造自己？社會主義有沒有可能營造出社會主義新人？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新人，社會主義有沒有可能？

**陽和平** | 這個改造不是修身養性的東西，而且不是說先把人改造了才有社會主義，這個改造就是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中國共產黨成立，然後每次路線鬥爭最後到1942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延安整風它就是一邊抗戰一邊學習。我們只能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離開改造世界去改造自己是不可能的。問題的關鍵不是老百姓的改造，最關鍵的是先鋒隊的改造。因為你既然做一個先鋒隊你必須是領先的，但問題是先鋒隊裡很多人變成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北京的黃紀蘇老師，創作過《切·格瓦拉》、《我們走在大路上》

airiti

等等作品，講了一段話特別有意思，他說，一個是反抗壓迫的革命，一個是消滅壓迫的革命。反抗壓迫者往往自己變成壓迫者，消滅壓迫是消滅壓迫人的制度。這兩種人在剛開始是看不出來的，都是參加革命的，因為消滅壓迫肯定要反抗壓迫，但目的不一樣，他要消滅壓迫人的制度。但是很多人起來搞革命的時候，他自己不一定是很清楚的，人們都是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改造自己，毛澤東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所以有意識地、自覺地經常通過黨內整風在1949年以前去改造先鋒隊的世界觀。走資派就拒絕這種改造，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轉變就是走資派利用右派的進攻作藉口去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去掩蓋他們自己走資的傾向，拒絕自身的改造。

**林深靖** | 現在好多人把它搞成是蛋生雞，還是雞生蛋的問題。到底是有了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有社會主義新人的產生，還是先有這樣子的一種人格然後才能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當然老陽剛才的講法我很滿意。包括你把過去中國大陸的經驗都提出來了，比如透過整風改造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其實是整個社會的典範，所以為什麼在整個過程裡要去塑造一些像雷鋒這樣的典範，基本上就是一種社會主義新人的典範。我們可以了解在整個建黨過程裡面有這個需要，也很清楚這個問題之所在。人必有私心，這個私心正好被資本主義利用為是打造你剛才講的私有財產先深化的藉口。那如何改變這種人的私心，如何改變這種私有的欲望？也許比較古典的哲學家會稱為是比較「利他」的思想，社會主義裡就必須有「為公」的思想，因為它是公共的、群體的，所以它一定要有公共化的思想，那就是要壓抑個人的私有欲望。

**陽和平** | 我恐怕不太同意……過去有種「大公無私」的說法。大公無私實際上是錯誤的，「公」在古代是皇帝，「無私」那你幹嘛反抗資本家壓迫，你幹嘛不「無私」地向資本家貢獻？根本不在要不要「私」，而是這個「私」的需求通過什麼途徑來滿足。比如說北京現在是首都，也是「首堵」，最堵的城市。大家都有交通的需求，每個人光考慮自己交通的需求買新車使得大家的交通更

airiti

混亂。如果我們知道大家都有交通的需求，咱們把大家的交通通過公共交通解決，那個人的需求也迎刃而解。所以我們不是壓抑自己的「私」，我們壓抑的是把個人利益凌駕在總體全局利益之上，而不是否定個人的利益。全局利益不是簡單的個人利益的組合，是個先後的問題。所以共產主義不是修身養性，「社會主義新人」就是不要有「派性」，「派性」的問題就是他從個人的小集團利益出發，不是從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所以大家討論或爭論的問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到底是出於團結的願望，通過辯論、討論要麼改變自己的觀點然後接受別人，或者是通過說服別人達成共識。另一種願望呢，就是通過辯論看誰牛，看誰能辯過誰，要出人頭地，要當人上人。所以我們要迴避那種把「變成新人」當作宗教的態度，我不是說你是那意思，但我覺得我們現在要特別小心，就像是剛才我講的，我們要捍衛的是「共有制」而不是「公有制」。中文的「公」很含糊，它不區分到底是「皇家的」還是「大家的」。《共產黨宣言》不是《公產黨宣言》，這裡面有差別，所以現在的統治者就用「公有制」來混淆是「共有」還是國有資本集團所有。

**杜繼平** | 關於這個我提一點我的看法。《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獻，但它是筆記形式的，寫得非常抽象而且簡單，實際上是個濃縮思想觀點的簡要筆記。比如說關於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絕大部分人都沒有搞懂，裡面講的第一條、十一條等，都有點晦澀。在《提綱》裡面，他實際上是從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出發，同時論及了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問題。主要是講主客體的辯證關係，客體就是外在的客觀世界，主體就是我們人。我們人跟客體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客體先存在，我們人有我們的勞動。當然我再順便說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不是狹隘的政治革命的實踐，它是廣義的，特別是以勞動改造世界為中心的。所以毛澤東才會講說實踐包括生產勞動、科學實驗、政治鬥爭，不是狹隘地只講政治鬥爭。人類歷史的發展，包括人的文明，人的知識、智識的增加，就是人對客觀世界的改造的結果，在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中逐漸提高、增加人的智力。你在改造的過程中碰到困難要克服，克服之後就增加你的知識和技能。所以這就是改造世界的同時改造了自

己，這個含義是廣義的，除了知識之外當然包括我們的意志力，包括我們的各方面的能力的增強，包括革命的鬥爭的經驗的累積、革命能力的增強。這就是主客體辯證的相互關係。人類的歷史就是在這樣的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關係中不斷地發展，在這個改造、鬥爭的過程中，對客體的認識就越來越多，廣義的客體也包括人類的社會，於是在改造、鬥爭的過程中，你就同時也提升和改造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關於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問題，好像馬克思把理論和實踐看成了兩回事，好像馬克思認為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是無關的，不要只是解釋世界，重要的是用革命來改造世界。馬克思的《提綱》主要是針對之前青年黑格爾派裡面的鮑威爾(Bruno Bauer, 1809-1882)、施蒂納(Max Stirner, 1806-1856)那些強調人的自我意識，認為人的主觀意識改變之後世界就跟著變的觀點而發的。他是針對那個講的，所以不是說解釋世界不重要，而是說解釋世界可以讓你了解現在的狀態，但是如果你要達到改變現在不合理的世界，要通過實際的革命的實踐才能改變客觀的世界，達到你的主觀目的，也就是你原來預期的、好的、善的。但是你這個好的、善的目的必須建立在你對客觀世界真實的理解上，對客觀世界真實的理解跟你那個主觀上的善的目的，是必須要結合的。你主觀上自以為是的正義、道德什麼什麼冠冕堂皇，再漂亮再崇高的理想，如果你不了解客觀現實的話，絕對不能成功，而且反而會適得其反。馬克思主義一直強調理論和實踐必須要結合，而且是在辯證的發展過程中結合，你在實踐的過程中通過每一次成功或失敗的經驗，總結以後再不斷加強你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它的能力。我們今天辦這個座談會為什麼強調要總結經驗？馬克思主義強調要總結經驗，才知道哪些是可以繼續保留，哪些是失敗、錯誤應該要糾正的，而理解了之後在下一個階段就能夠更好地、更有效地來達到你的那個好的、長遠的目標。

特別困難的是破除幾千年來私有制所造成的人的思想。所謂「自私是人的天性」，這種說法是胡說八道，我請問你在私有制之前，包括我們從小念的〈禮運大同篇〉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是什麼社會？那個是存在過的，原始共產社會裡就這麼個形態。你看看好多原始部落，沒

airiti

有私有財產、私有制的原始社會，就是群體共居共享。回過頭來講，你必須要去面對，你要去變革，你要革資本主義的命，《共產黨宣言》裡講不但要跟私有制決裂，也要跟所有的舊的傳統徹底地決裂，這個是非常困難的。從列寧到毛澤東都體認到這一點，習慣勢力，幾千年積累下來的那種舊的價值觀、舊的行為模式、種種的風俗、舊習慣的慣性是最難破除的。所以文革才講「破四舊，立四新」，舊思想、舊文化、舊觀念不改變的話，即使所有制變了，經濟體制變了，行為模式跟價值觀沒有變的話，你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就會出現眾多的問題。所以必須重新改造世界觀就是這個意思。特別是舊的知識分子大都是受到資本主義影響、教養長大的反共的、自由派的，他那個世界觀沒有變的時候，就不能支持、適應社會主義的道路，就要反共、反社會主義，強調他原有的個人主義。所以才有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問題，而思想改造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勞動改造。

**聽眾** | 依照馬克思主義，要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前到底需不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資本主義發生之後我們要馬上抑制它，還是應該要借助它，至少應該要加速讓它蓬勃發展一陣子之後，我們再進入社會主義？因為在俄國和中國，列寧的發展路徑好像是說可以直接跳過資本主義嘛，馬克思這部分各種說法我都聽說過，但不是很清楚，所以向各位請教。第二個問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對工人的分析，但在俄國和中國是用在農人身上，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指導我們農業應該怎麼才是正確的發展？像是要傳統的小農經濟還是集體化？可是集體化之後、農業生產社會化之後，好像開始在農業裡面實行資本主義，我想請教馬克思主義思想對農業發展有什麼指導？第三點是，就像剛剛老師講的，共產主義是共產而不只是公產，所以說共產主義是以不要資本家私有制又不要官僚集團來掌握國家公有資本，而是交由工人自己來掌控公產資本，這究竟是怎樣的世界，我還不是很清楚，沒辦法完全想像。過去的歷史上像毛澤東、史大林實行的社會主義，很多人也說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結論都要說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究竟我們有沒有實行過社會主義，還是說我們



airiti

看到的也只是國家資本主義？回到第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有沒有辦法跳過資本主義直接到社會主義？謝謝。

金寶瑜 | 我想回答這個問題，剛才很多問題沒有講，因為我想明天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講。你的問題非常好，假如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話，像西歐封建結束之後它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落後國家呢，資本主義沒有辦法、發展不起來，因為先進國家不讓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像英國占領印度，要把很多廉價的紡織品賣給印度，它就必須不讓印度發展自己的紡織工業。資本主義必須要由資產階級領導，西歐的經驗是資產階級戰勝了封建主，從那個過程裡面形成他們的力量進行工業化。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得非常少，資產階級就沒有力量。孫中山先生革命，就是要由資產階級起來革命，消除封建，並不是要走社會主義。而蔣介石必須背叛革命，他代表很少很少的國內的資產階級，所以他必須要與地主結合，而跟地主結合就不可能做基本的土地改革。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你看落後國家都沒有辦法進行非常徹底的土地改革，沒有土地改革就消滅不了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跟西方國家抑制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毛澤東才提出來「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要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樣要消滅封建，可是由誰來領導呢，只有無產階級來領導，才能夠進行。所以你說的對，前面一段的確是沒有馬上想要進入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要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國家資本主義再實行。一直到1956年之後到1979年所實行的社會主義跟以前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每一處都非常根本地改革。公有制之後，國家有企業了，官僚管理企業跟資本主義管理企業有什麼差別啊？差別就在，工人是不是能夠一步一步地進入當企業的主人。很重要的一點是，每個企業，它不是自主核算，它賺的錢不是這個企業可以繼續投資，而是賺的錢所有都歸國家。這個企業所需要的錢通通由國家分配下來，包括工資、福利種種這些，都是直接從國家到企業，直接付給工人，不是經由廠長的控制。如果廠長可以控制，為了牟利要取得最大利益的話，那跟資本主義是沒有差別的。所以工資這部分企業沒有權力管，像陽和平剛才

airiti

講的，就是革命之後革命者如何不成為新的老爺，這個意思就是說，在社會主義企業裡面，企業的管理人怎樣不變成資本的代理人。假如說變成資本的代理人，那一切跟資本主義就沒什麼差別了。所以這是相當大的不一樣。

杜繼平 | 剛才這位聽眾的問題，其實我大概知道你提問的出發點。因為現在中共走資派對外的宣傳或者幫助中共走資派辯護的說法，就是說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不夠長，國家的生產力發展得不夠，所以應該補資本主義的課，而補課最好的方式就是國家來主導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是說認為過去過早地進入社會主義了。我是一九九〇年代在大陸念書的，這個論調那時候早就有了。剛才我在講蘇聯的歷史經驗的時候因為時間不夠，沒有講得很細。蘇聯在打三年內戰的時候實行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採取配給制，但是等到內戰結束之後就經濟凋敝，農民積極性低落，因為當時是用所謂的「餘糧徵集制」，就是把農民自己食用之外的所有糧食徵調到國家手裡面。所以列寧後來才被迫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就是搞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列寧已經公開講了。他說因為我們是一個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那麼今天唯有調動小農的積極性，讓他們生產農產品並且實行市場的交換買賣能夠獲利，他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以後才能夠使農業的產量增加，能夠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所以他就從「糧食徵集制」改成「糧食稅」，就是變成用貨幣，用稅的方式來收，不再實行過去的「餘糧徵集制」了，允許商品在市場上自由買賣。這就是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也就是說，他認為還須實行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要繼續發揮作用。但是他也強調一點，在實行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的同時要防範、要注意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列寧稱這是戰略性的退卻，引起了黨內包括共青團絕大多數人的不滿。這個新經濟政策一實行了之後，大家都說在搞倒退、回到資本主義，一半共青團員退團，還有著名的文學家自殺抗議。

當年我在大陸念書的時候，鄧小平在深圳的「南方講話」發表後，北大就有一個教授跳樓自殺抗議。走資政策的實行，讓原來一些有強烈社會主義信念的人很難接受。所以列寧用了很大的力量去說服，不斷地強調，說我們這

airiti

個戰略上的退卻是為了更好的前進，生產力能夠提高一點、經濟能夠好轉一點，要不然當時內戰後蘇聯面臨著包括糧食短缺等等，你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的話，政權還能穩嗎。所以他有一段的退卻，但是他一方面又警惕，包括跟外國公司簽租讓協議，跟外國資本家做買賣，他都警惕地把它放在一定界限之內，把它當作一種手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手段。中共為什麼講「新民主主義經濟」？就是沒有全部公有化，而是還維持了原來的民族資本家，民族工商業還是存在的。實際上就是採取類似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國家資本主義。到了1953之後才進入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改造完成後才正式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所以事實上，中共是非常了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以及中國確實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經濟形態之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間不長，生產力比較低等問題，它也考慮到這個，所以資本主義也實行了一定時期。

文革之後，所謂要回到新民主主義時期甚至倒退到資本主義時期，這種論調一直存在。到現在從中共的實踐來說它實際上就是倒到資本主義去，而不只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因為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國家還是控制著經濟命脈，私營經濟的比例是很低的。現在大陸已經不一樣了，現在大陸雖然是國家政府在主導經濟的發展，但是從經濟本身來說，私有經濟包括外資的比例已經遠遠超過政府的控制。

**金寶瑜** | 我覺得還沒回答完，再補充一點點。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區別，資本主義是由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僱傭工人來生產。你要變成社會主義的話必須由工人掌握生產工具，這是基本的差別。可是工人掌握生產工具不是一步可以做到的，就很困難。就像陽和平剛才講的，在文革裡面工人階級會非常保護領導而把自己工人兄弟給傷害了。就是說在革命之後，工人階級很普遍的想法是，對共產黨非常感恩，因為跟以前的制度比起來，天地之別，他們覺得所有他們得到的都是共產黨給他們賜予的。假如是資本主義道路，所有「賜有給你的」都可以拿回去，就像現在一樣，所有的以前拿到的，工作的保證、工資的保證、福利的保證通通拿回去了。所以工人得自己鬥爭才

airiti

能保住這些，文化大革命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工人要怎麼樣掌握生產工具，工人怎麼樣治廠。假如這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的話，你連工廠都不能治的話，你治什麼國家呢？所以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工人掌握更大的權力。剛才那位朋友問的私心不私心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跟劉少奇很大的區別，劉少奇還寫了本書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共產黨員是靠修養的，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只有在鬥爭裡才能變成更有自覺性。而且還有一點，就是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陳信行 | 關於工人治廠，我這裡可以補充一個例子，就是在1989年到1992年瑞典的富豪汽車(Volvo)曾經建了一個實驗廠，一般被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落實到工人治廠的最高潮。汽車裝配大概是最常被人拿出來講的那種對工人的殘酷的剝削跟控制吧，你一個人在生產線上就做那幾秒鐘的動作，一天重複幾千次。那個廠叫作伍德瓦拉(Uddevalla)。他們改變想法，說你一直重複那個動作的話，第一個，工人很容易被替代；第二個，工人在現場重複勞動會傷害身體；第三個，你人生沒意義。所以在那個廠裡，他們把本來是七百人做的一個生產線變成一個一個小隊，一個小隊就八個人到十個人，半天的時間組一台車。這樣算起來呢，它那個廠的生產力跟七百人半天做出三百五十台車是一樣的。

那個例子在勞工研究裡常常被人提到，說是完全站在工人福利的角度看如何去改造一個生產過程。生產過程它不是不能改造的，工程師就是被訓練來改造生產過程的嘛，這個是辦得到的。有意思的是，為什麼在1992年就停止了？第一個就是1992年瑞典自己碰到經濟危機。第二個就是非常重要的，1992年蘇聯已經不存在了，所以瑞典資產階級沒有必要為了工人福利再多幹什麼事。工人、工會自己願意退卻。所以那個廠就變成古往今來的、工業製程科技特別認真為工人著想的最後一個餘暉。從那之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有哪一個公司是專門地為了讓工人覺得工作有意義、人對工作有控制、可以再工作中保持生理心理健康來設計一個科技，反而是讓工人又回到老路，工人去適應機器，而不是機器適應工人。我覺得我們可以想像，未來，萬一

有一天工人又掌權的時候，我們怎麼掌權？我覺得這是一種參考。

陽和平 | 最後那個問題我覺得值得回答一下。就是工人階級掌權的勞動經歷是什麼樣子，我經歷過。我在毛澤東時代的工廠裡當過五年工人，然後在美國的工廠工作十多年，差別是非常大的。我每次回到中國，工人老問我的是，美國工資多少。我老是在講地位的差別，他們聽不進去。我老想為什麼對毛澤東時代當工人那麼懷念，這裡邊不是因為我懷念當時吃糧食要糧票，買布要布票，這些物資的匱乏。我懷念的是當時的人際關係，因為我們當工人沒有獎金，工資不能扣，人不能開除。也就是說，沒有胡蘿蔔也沒有大棒，你怎麼讓工人幹活？在這個社會你試一試，沒有胡蘿蔔也沒有大棒沒人幹活的。所以人們就是想像不出來，這裡面肯定是奴化教育，或是強逼的等等，但你怎麼逼啊？當時既沒有胡蘿蔔也沒有大棒，但是我們工作還是比較努力的。不是拼命幹，電視鏡頭一照大家就拼命幹活，那不是幹活的，幹不下去的。當時挺敬業的，不是沒有懶惰的，懶的有，但不用偷懶，他明目張膽地懶。我到美國學會了「磨洋工」，「磨洋工」是技術活，必須讓老闆看不出來，你幹得特別歡實但就是不出活兒，這才是技術。這個對比非常有意思。當時對這不太理解，後來才理解到「大鍋飯」、「鐵飯碗」是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必要條件，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為什麼是必要條件呢，你想想，如果你的獎金、你的工資甚至你的崗位取決於領導對你的態度、對你的評價，你怎麼批評領導？

我八〇年代的時候思想特別困惑，跟我父母爭得面紅耳赤，認為獎金是應該有的，但是後來就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我是1974年離開的，1977年又回到工廠裡邊，改革開放開始了他們又特別特別高興，1979年了也高興一點兒，到八〇年代慢慢都不高興了。為什麼不高興呢？開始發現給工人十塊、五塊獎金他挺高興的，後來他發現他自己的五塊、十塊哪兒比得上領導的五十塊、五百塊？後來他又發現誰得獎金，誰又不得獎金不是看誰幹得好而是看誰跟領導關係好。最後變成，老百姓有個順口溜就說「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服不行」。所以在改



airiti

革開放以後才出現了「大鍋飯養懶漢」的現象。為什麼要砸「三鐵」、砸鐵飯碗，因為如果工人有鐵飯碗的話，只有他的獎金是領導安排的，如果工人不服，領導給他派活，工人就說，「某某有獎金，讓他幹」。沒有胡蘿蔔加大棒，你指揮不動工人；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是既有胡蘿蔔又有大棒。美國一個頂級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1943-)，他就通過嚴謹的數學證明了馬克思失業後備軍的作用，就是說你的工資水平必須高於市場均衡的工資水平，你才能制約工人。失業必須是痛苦的，所以你工資高於市場均衡，是胡蘿蔔；你要不聽話把你開除了，是大棒。

在毛澤東時代，不存在這些東西。那麼為什麼那時候我們工作好呢，就是因為你知道你工作不是為車間主任，不是為廠長幹的。我們說是幹多幹少都一樣，我是學鍍工，是一級工，別人是二級工、五級工、八級工，其實工資都不一樣。長遠來講，如果你經常消極，一、兩年後評工資的時候，大家說你工作不積極為什麼要給你評？所以它是有差別的，不是絕對平均化的。但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是分工的不同，不是地位的不同。那時候大領導到車間來，工人沒有過「恐懼」的心理，跟我在美國當工人完全不一樣。在中國時候，領導來了，工人該休息的休息，該幹活幹活，領導來了照樣幹，而且往往是帶著說俏皮話兒：「哦，大領導，好久不見啊！」言外之意，你脫離群眾啊。領導為什麼做領導啊，他的決策、他的指揮，必須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別人信服你，覺得你有道理。你要是偏心，你要是粗暴，你要是做得不好，那工人消極抵抗很容易。所以你要看到社會主義時期工人消極怠工，不是因為人性的懶惰，不是因為「大鍋飯養懶漢」造成的，是因為與領導的關係僵化、對立，嚴重還罷工呢。但是大多數勞動人民，說實在話，他是閒不住的。他老是想做一點什麼東西，一塊兒上班來，一邊聊一邊幹活，有的時候大家都休息了他就掃掃地幹點什麼，很多人確實是閒不住的。咱們的鄰居、街坊，好多人都是這樣。勞動人民確實對勞動不厭惡，而勞動不是一種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所以有了中美兩國當工人的經歷以後，我才珍惜毛澤東時代的那種人際關係。

airiti

**陳慈立** | 大家好，我是衛促會的工作人員，衛促會全名叫「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非常謝謝剛剛四位老師為我們帶來的有歷史的、有批判的分析，還有一些在組織上面的刺激、思考。上個禮拜在「台社論壇」報告了一場跟組織生活有關係的內容，就是剛剛陽老師特別談的這個「自我改造」，這超級難的。因為我從小的生活可能跟在座大部分年輕人一樣，我們就是資本社會養成的，我從來都知道什麼「共產主義是我們必須打倒的敵人」，在我們台灣教育體系裡面。所以我們養成的這些東西，譬如說這些觀念都對我們現在做公共衛生改革運動工作造成很大的挑戰。在我們的團隊裡面，當然就有嘗試著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功夫，也很難，被批評的時候就會超不爽的。剛剛我聽陽老師還有林深靖的對話就覺得非常地有感，一度很激動。我在台社講過的一個東西延續到這兒想要跟大家對話，像台灣很多運動圈的前輩在這邊，我們常常會講一句話叫作「運動傷害」。然後再來談我們個人改造的工作，能不能脫離集體，我當然是覺得不能脫離集體，可是在集體裡進行個人的改造工作，非常困難，甚至會造成集體的崩潰離析。在自我改造當中集體和個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們也聽到有一些人說，比如我可以在環境運動中往前衝，但是我不在這裡進行我的組織生活，因為萬一我在這裡進行我的組織生活，我的改革工作就別幹了，因為我的夥伴會離開我。那這樣的實踐跟自我改造看起來是很背道而馳的，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怎麼想這個問題。

**陳信行** | 我對於組織崩潰離析很有經驗，對組織裡大家相互不爽超有經驗。我個人想，馬克思主義為何從工人運動出發，除了客觀的分析，就是資本主義會製造出越來越多它自己的掘墓人等等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說，工人運動或是類似工人運動的其他群眾要反抗壓迫的——還沒有到消滅壓迫——運動，在這裡面我們會學政治課。政治課就是我們受壓迫群眾要辦好一個事情，譬如說罷工，你如果不懂得怎樣處理群眾內部的矛盾的話，絕對是辦不成的。我們只要分裂，就一定會輸。絕大多數的時候，工人們要反抗老闆當然是輸的。但是偶爾一次兩次贏了之後，大家漸漸學會說，哦，贏的狀況是什麼樣，輸的狀況是什麼樣，在這個過程中工人會自己教育自己，而這個

airiti

「自己教育自己」事實上就是新社會的希望——來自這種具體的經驗，而不是說來自聖人告訴我們說該如何為人處世啊什麼的。

所以回到台灣的運動界狀況就是這樣子嘛：大家一起為什麼做一件事情，都是我們認同的。你如果不做的話，去當良民，也過得挺好的。這個時候大家勞逸不均啊、意見不同啊等等的，大家互相批評，如果批評到大家鬧翻了，那這個事情就完了，大家就各自回去當良民，這事情也就沒了。但是，如果大家覺得說共同的理想是大過我們個別人的一時的情緒、一時的感覺，我們可以為了我們大家共同的事情，也許多聽聽彼此的意見，那本來看起來很嚴重的矛盾或許就解決了。除了說我們追求的目標本身有意義之外，這個運動的過程裡面，自己教育自己的這方面，我覺得也是使得參加運動為什麼重要的原因——新社會的可能性就存在於我們每天怎樣過集體生活的經驗裡面。

**陳慈立** | 想要再繼續對話，就是剛才信行講的，我們在這個集體裡為了一個抗爭目標去達到「相互容忍」，我不太同意。我們在談的這個「民主集中」，它到底是怎麼個民主集中？我們，剛剛陽老師也提到說民主不是一人一票，我們大家選的也不是這樣子，要不我們大家幹嘛要去抗爭，總統就是我們選出來的啊，對不對。比如在集體裡面我們怎樣進行這樣的集中表達我們的意見，比如組織之間我們怎麼去對待，比如我們個人生活要怎麼去對待，比如說我今天小孩丟在家裡，我才能上來，等等。就是怎麼讓個人的改造跟彼此之間、組織之間聯繫，怎麼相互去傾聽——或者不只是傾聽，傾聽太溫和了，而是說我們組織之間怎麼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我認為不只是容忍，如果只是容忍的話我們就不會繼續在這裡了，而且顯然絕大多數是大家忍不下去就走了。我自己隱隱感覺不是這樣子。剛剛陽老師講的，我們要反抗壓迫、消滅壓迫，我自己感覺，反抗壓迫是個人的事情，但是消滅壓迫必須是集體的事情，所以在這件事上還是要回到集體生活，但組織生活怎麼去支撐個人的自我改造甚至是社會實踐的工作？我比較想講的就是個人和集體在這裡的關係，它們不是相互成全而已。

airiti

邱士杰 | 剛剛第二位同學講的問題我覺得也是很重。各位知道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同時也是《資本論》第一卷一百五十週年。在俄國革命裡面，列寧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裡面首屈一指的農業專家，所以他那個時候提出來的革命方案其實是「兩階段革命論」。特別是1905年的革命，農民起來造反，要奪取全部的土地，而不是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講的，把地主的割地收回來。列寧就改變了看法，他說我們要怎麼樣配合農民革命。所以那時候提出來的專政口號是「工農民主專政」，他設想的是農民奪取政權之後怎麼去參與政府的方案。他根據《資本論》第三卷的地租理論去設想這個東西，這個當然就牽扯到兩個很重要的經驗，一個是普魯士的經驗，一個是美國的經驗。普魯士的經驗就是從貴族地主跟農奴之間的關係轉化成農業資本家跟農業工人的關係，這個帶有很多的封建殘餘。可是美國的經驗不一樣，它是帶領小農往西部開墾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比較自由、全面的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列寧來講美國的經驗不錯，所以他就要想如何在俄國搞一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革命，他提出的方案就是國家要把所有土地國有化。土地國有化不等於社會主義，而是一個最激進的資本主義發展方案，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地主，然後願意當農場主的農民就可以來跟國家承租土地，農民獲得平均利潤率所規定的利潤，多出來的就作為資本主義的地租交給國家，這個是他的講法。可是到十月革命的時候，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他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個公式，決定讓工人自己奪取政權，工人奪取政權之後就出現了一個狀況：它雖然宣布土地國有化，可實際上那只是說禁止僱傭勞動的使用，其實使用權全部是歸農民的。所以你知道在1929年的時候，蘇聯才進行了農業集體化的改造，才成立集體農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17年成立，到1929年才搞農業集體化，這顯然是我們台灣人很少去關注的一個問題，這是個矛盾，也是現實。

大陸也是這樣，1949年革命成功，過了好幾年才搞農村集體化。其實國家與小農之間的關係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跟小農之間的一個問題，所以在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矛盾點就在這個地方：到底允不允許農村資本主義發展。比方在中國經驗裡面，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時

airiti

期」要去鞏固政權，劉少奇就說因為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我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所以我要資本主義可以發展起來。可是問題是，你發展它就會有階級分化的問題產生，那怎麼辦？我要維持無產階級專政，要維持國家公平正義的形象，當然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不是資本主義好像自然有一個生產力的累積，累積到一個量之後它會變成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完全不是。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本身就有跟它相適應的生產力，那這個生產力跟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不是直接有接續關係的。即便說這個社會主義生產力可能它的有機構成可能沒有像美國那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那麼強，它是限定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它會帶來更好的人和人的關係，它可以讓這個國家有更好的發展。我覺得陽老師剛才一直在講的，大陸當工人的經驗為什麼比在美國當工人的經驗好，就是在這裡。也許中國工業的有機組成或者是它的物質條件並沒有那麼好，可是它讓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讓這種不應該存在的權力關係消失掉。那我覺得這是資本主義階段在共產主義者的設想裡必須被跳過去或者很快過渡的原因，因為你要維持這個東西的話，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被推翻掉，就維持不下去。這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是客觀上它必須去這樣想的。這是我的一個淺見，貢獻給你參考這樣。

陽和平 | 剛才提的左派裡邊、群眾運動裡邊會產生各種分歧。我覺得咱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考慮，就是分歧有兩大類，一個是大方向的分歧，一個是方式方法的分歧。大方向的分歧一開始容易不清楚，因為這裡邊，你說環保運動我們的目的是什麼？這裡邊肯定有差別，有的說改良，有的是利用環保運動去啟發人民知道怎麼捍衛自己權利。後者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有人就會說你別有居心，所以大方向裡邊不一樣。還有一方面就是我們都是私有制下的產物，我們要時時刻刻地解剖自己，跟別人爭論、討論、爭執的時候，有多少我們討論的是真理，有多少是在炫耀自己，有多少是希望爭當「人上人」、希望出人頭地。這裡邊有的是自覺，有的是不自覺的。中國的文化革命裡有很多派仗，它的出發點就是這個。你說它大方向是不是一樣的，當時是看不出來的。但是方法裡面它就顯示了明顯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那



airiti

種思想。我自己也經歷過，為了辯論就不擇手段，哪怕編造東西都行。「你看我說得你沒得答了，我多厲害！」這裡邊有很多私心雜念，所以在左派運動裡邊、人民運動裡邊，根據文化革命的經驗，毛主席講最難的問題就是怎麼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的道路上來。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過程就是咱們去通過革命實踐裡邊把自己的私心雜念——為了個人出風頭、為了個人利益，頑強拒絕改造——去掉。

我覺得所有進步人的一面鏡子就是張國燾。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學生領袖，然後參與組織了很多工人運動，很厲害。1927年「四一二」以後呢，他又開始搞武裝起義，搞大暴動，搞了一片根據地。紅軍長征中，他跟中央紅軍相會的時候，中央紅軍不到一萬人，他帶了八萬人。這麼一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人，最後一個人跑到國民黨那邊去了，就是因為他不能當「人上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我當不了「人上人」，那我找更小的環境——群眾運動裡邊，要出人頭地成了他的最高綱領。要不然你難解釋這麼一個論資格來講、論貢獻來講是非常厲害的人。另外一個，毛澤東是怎麼和張國燾鬥爭，為什麼張國燾手下的所有人都跟他決裂了——不是決裂，都改變思想了，承認錯誤了。張國燾拒絕，最後他一個人走，連一個警衛員都帶不上。毛澤東跟張國燾的鬥爭方法就是團結大多數，就是說服教育，然後批評與自我批評。跟史達林對付托洛茨基，差別太大了。張國燾手下那麼多人，大多數人都是要革命的，也相信張國燾是要革命的，給他各種機會。但他最後找藉口，從延安跑到黃陵祭祖，然後跟著國民黨的車回到西安；共產黨先找他了，他非要去武漢，到了武漢周恩來還專門找他，他非要去國民黨。他確實是我們的一面鏡子，你別看多麼「領袖」，你最關心的是個人的地位、個人的出人頭地，你最後一定背叛革命。

**高瑋蘋** | 各位老師大家好，我也是在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工作。因為今天我們的題目是「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剛剛陽和平老師提到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也改造自己。現在在我們的組織裡面，我們的一個共同目標，就是推翻或者改革這個資本主義對我們種種的影響或者是迫害。我們覺得未來可以

airiti

擺脫資本主義所以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認為剛剛陽和平老師講的，其實就是我們在組織裡所做的事，就是怎麼樣透過改造這個世界，同時也改造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的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常常也被其他組織問說我們怎麼決定「集體」到什麼程度，我在想的是「集體」它到底要到什麼樣子的範圍才能達到「集體」？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或方法，它才能達到我們所做的是通過集體的決定做出來的？這也是我們現在在我們的組織裡面一直在做的事情。但因為我們是做公共衛生的，可能碰到其他的組織的時候，有的人就會提他在這個過程裡面打一個政策，只要這個政策訴求出來了那就好了。但是他自己是不是在這個過程中有改造自己，或者是同樣用一個在資本社會下的價值觀去做這些他想要改造的事情？這是我第一個想法。第二個是，在我們同輩裡面談社會主義常常是說——我是想回應信行老師說的——很多人對於社會主義沒有正確的認識，所以就會說：「以前都失敗了，現在重提它做什麼。」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對認識社會主義有很大的斷裂，雖然它過去有它的失敗，有它的現實，但是我們如果沒有從這過程中認識到問題是什麼的話，我覺得就會有錯誤的認識，就會覺得：「啊社會主義它是個沒有辦法走下去的道路。」第三個是，剛才信行老師有提到說，教育醫療現在變成是產業而不是公共服務。其實我們在11月24、25日的時候也有一個研討會，是要談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工會與醫療的問題。我認為我們雖然都是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領域努力，但我們有共同的目標，所以希望如果是關心公衛醫療的朋友也能夠一起來參加。

陳信行 | 謝謝你的回應，我很贊成你剛剛說的，我想再補充一點。我們之所以要紀念十月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各種改革運動，包括你們在從事的對公共衛生的改革，包括我自己是高教工會的會員，我非常希望台灣的高等教育能夠公共化，這些東西都可以說服很多人。但是，如果我們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話，那任何一個部門的公共化就會不斷地被侵蝕。台灣的醫療算是部分地公共化了吧。全民健保，好歹比美國好，好歹比大陸好。但你能看到台灣的醫療體系如何被資本一直吞、一直吞、一直吞

吃，隨時都處在危機中，一不小心，這個公共化的體系就消失了。假設有一種狀況之下我們把全台灣的大學都公共化了，大家都不用交學費啊，那很好，拍拍手。但是這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公共化後的這個高等教育體系還是會不斷地處於危機中。

所以除非整個社會都是走這一條路，互相配合得起來，那才真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現在世界經濟連帶這麼大的狀況之下，也不是說這個國家、那個國家單獨走這個道路可以行得通的，至少要有一大批國家共同走這個道路，這樣子我們在各個小角落想要推動的這些公共化的改革才有可能變得可長可久，可以穩固。在這之前，我們的改革運動肯定挫敗是難免的，很多想要推的事情，明明很有道理，但是後來就是會失敗嘛。所以我覺得不斷地在不同的角落經驗了改革的挫折與失敗之下，去思考一百年前在俄國的那件事情，是特別的有意義。

**金寶瑜** | 而且自從帝國主義全球化之後呢，資本占據了每一個本來共有的空間，所有的東西都要私有化。資本它在進攻，我們在後退。像美國不只是醫療系統私有化，現在連國民教育也是資本化，准許私人資本為盈利經營教育。然後監獄也私有化，甚至聯邦調查局的那些僱了很多外包的人來協助他們工作。最近有件事情沒有實行成，支持教育私有化的新任教育部長德沃斯 (Betsy DeVos) 的弟弟——黑水公司普林斯 (Eric Prince)——在伊拉克戰爭裡賺了很多很多錢，他本來要把阿富汗的戰爭完全私有化，完全讓他包下來，但沒有敢做。總之，資本一直在進攻，我們就一直退一直退，退得簡直沒有辦法可以再退了。

## 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世界共產運動的影響

**陽和平**（對10月21日發言的補充）| 本來讓我來是要我來談文革，我覺得大家沒有在大陸經歷過的話比較難認識這個問題。所以我昨天用「民主還是財主」這個來分析私有制下的你們的那種民主和大陸文化革命運動中的「大民主」之間相同的地方和差別的地方。但是大家會想：「你看這個大鼻子怎麼會講這種話」，所以我要做一個很簡單的個人簡介。我父母都是在二戰結束以後到中國去的，我媽是核物理專家，搞原子彈的，當時在「曼哈頓計畫」裡邊，我爸爸是養牛的。

**黃德北** | 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全世界都以為中國大陸能夠做原子彈是因為他媽媽參與的，但他媽媽事實上沒有，他媽媽到大陸去了以後基本上從事農業發展。

**陽和平** | 是，這麼說好像中國人自己搞不了似的。我是在中國生長的，當時在農場長大的，然後遇上文化大革命串聯。七〇年代中美關係和解了，我舅舅來到中國，周總理接見我們有五次，我都參加了。然後在中國當工人有五年，在美國當工人十多年。開始到美國呢，還有點兒自信，但到後來自信越來越少。尤其到六四後，我們當時非常大的困惑就是，歷史現實是十月革命以後我們發現大多的社會主義執政黨都走向了它的反面，本來應該是人民的公僕變成了人民的老闆、老爺。怎麼防備革命者成為壓迫者是一個世界性的大難題，用毛主席的話講是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我把這個話重新說是防止革



命者成為壓迫者。在美國當工人時也參加工會運動，那時候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工會運動的前景是什麼。如果工人運動最後還是扶持一批新的壓迫者，那麼我們在美國搞工運就是理不直氣不壯。

金寶瑜 | 今天作為一個左派，對文化大革命是否肯定是個關鍵性的問題。你們大概都知道，中國跟蘇聯之間有關共產主義道路應該怎麼走的爭論，這場



airiti

爭論開始公開是在1956年蘇聯的二十大開會時，會中蘇共對史達林完全否定，並且提出以可以和平進入共產主義的論點，蘇聯倡導全世界想要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都不必自己去革命了，只要依靠蘇聯就好，蘇聯老大哥可以幫助它們。而且蘇聯基本的態度是跟美國妥協。在1963至1964年間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九封致蘇聯共產黨的公開信，中國共產黨全面批判了蘇聯修正主義的路線，可這只是文字上的批評，具體實際上應該怎麼做呢，以後革命的路到底該怎麼走呢？全世界要走共產主義道路的國家的共產黨都非常疑惑，搞不清楚。中共自「九評」之後開始整理自己的思路，要怎樣把革命路線付諸於實踐？在這之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其他世界要走共產主義的國家清醒過來。在這個之前，世界上很多共產黨，像我昨天講的美國的共產黨，在上世紀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時做了不少的事，像組織工人階級來發動工人運動；可是後來當蘇聯走向修正主義道路時，這些政黨就迷失了，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走，繼續跟著蘇聯走的政黨不管蘇聯做什麼，它們還繼續為蘇聯辯護，就使得大家非常迷惑。

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是完全肯定的，我肯定的一些東西就是中國要防止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話，就一定要走這樣的路線。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我被邀請去德國開一個毛澤東思想討論大會。我那時候想，在左派如此低沉的時候，一定只有三、四十個人吧，沒想到差不多到了一千個人，這場紀念會是德國的馬列黨和菲律賓的新共產黨（以社會研究為名）聯合辦的一個會。這次的會使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沒有幾年，約1966年的時候，各個國家原來的共產黨都開始分裂了，分裂出來另組政黨不再跟著原來修正路線走，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反修正主義的新共產黨，在德國成立的是馬列黨，菲律賓成立的是菲律賓新共產黨。

台灣的朋友對菲律賓的情況比較熟悉，可是要繼續革命的不只是菲律賓，在參加1993年毛澤東思想討論會的還有好幾個拉美的共產黨，包括拉美最大的阿根廷的共產黨，還有有從南非來的、有法國的新的共產黨、西班牙的、義大利的……現在可以說，假如還要繼續革命的，就都是毛派共產黨。毛派共產黨把跟著蘇聯走的黨叫「修正黨」，修正黨一個個沒落下去，因為他

airiti

們沒有別的事可以做了；他們已經說我們不要自己革命了，我們只要跟著蘇聯走，於是早在蘇聯解體之前，這些政黨也都一個個解體。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任何國家要革命的就必須從修正黨脫離出來，成立一個新的共產黨。像德國馬列黨成立的經過很有意思。德國共產黨在二次大戰時反納粹的鬥爭非常有成績，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有個名叫Willi Dickhut (1904-1992)的黨員脫離了黨，重新組建馬列黨。經過是Dickhut當時想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所以訂一些報紙和雜誌像《人民日報》、《人民畫報》一類的，結果他被他們的黨批評，最後被黨開除了，說：「你不能跟中國有什麼聯絡，你跟中國聯絡是不對的，我們這個黨是不贊成跟中國聯絡的。」所以他就被開除，開除出來他就另組織黨。那個時候西德有很多的共產政黨在冒出來，可是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共產黨，後來都解散了。這個德國馬列黨是1980年建立的。他們的確是工人組成的，工人出身的黨員占百分之九十幾。

我在他們那裡學了很多。1993年參加開會的有來自美國、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代表。我開會時才了解，原來這些人不只是研究毛澤東思想，他們是用毛澤東思想在鬥爭中實踐的堅定的共產黨員。文革對他們的影響太大了，阿根廷共產黨主席跟我講，他們在文革時去參觀中國的工廠，看到好多大字報從天花板上墜下來，走路都要繞著過去，那個情景給他影響太深了。他們還被毛主席接見，《毛選》第五輯有篇文章說到毛主席接見幾個拉美同志，指的就是他們。印度共產黨也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他們有好多派，但到近年他們團結起來，進行武裝鬥爭。我認為今天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繼續，沒有斷掉，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假如說沒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話，像中國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家也就完全迷失了，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

菲律賓共產黨是我們知道的共產黨裡面最強的，現在有人民軍進行武裝鬥爭，他們不但有武裝鬥爭，而且他們有很多很多群眾組織，非常積極地參與各方面的鬥爭。在這方面菲律賓走的比中國當年革命時還走得更遠，值得我們得向他們學習。這些群眾組織，跟我們一般熟悉的非政府組織(NGO)完全不一樣。在菲律賓有很多年輕人如果有改革社會的意願的話，他們也會加入NGO，因為NGO針對一些他們關心的議題，像環保議題、婦女問題、

airiti

青年人問題等等。但是進去以後就要注意是誰出錢組織和支持這個NGO，每個NGO這都是跟隨著給錢的那個人的意願走。但是菲律賓的群眾組織就完全不是這種性質，每個組織都是會員自己出錢，群眾組織裡的工作人員就是給會員做事的，這些工作人員把一輩子奉獻在裡邊：每個組織有一個辦公室，工作人員，吃住都在那裡，做各種組織和鬥爭的工作。他們這種是合法的地上鬥爭；地下的，有共產黨，有人民軍。他們有工人的群眾組織、農民的群眾組織、年輕人的群眾組織、學生組織、護理人員的群眾組織、新聞人員的群眾組織、教師的群眾組織、移工的組織、原住民的組織等。這些組織全體會員總共有一百萬。工作人員只是拿很少的錢，夠吃飯就行，就獻身到革命運動中。

許多年前我跟菲律賓工人組織的負責人談過他們的組織是怎麼抗爭的，他提到工人罷工，我就問當時台灣的狀況是關場，那該怎麼辦？他說那我們就下去打游擊了。菲律賓的反對運動不斷地在積累、在壯大。而我在美國的觀察是資本不斷地積累，力量越來越大，可是社會運動不積累。常常都是一個事件發生一大群人都來了，鬥得挺好的，有時候勝利，有時候失敗，但基本上是不能做根本的改變。這個事件過了，人全部都走了；另外一個事件發生，人又都來了……他們運動的成果積累不下去，也不能從成功中做總結或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沒有辦法形成一種力量。我菲律賓去貧民區參觀他們那邊的工作，貧民區那批人聚集起來是因為馬可仕的太太（就是那個有一千多雙鞋的女人）要蓋個紀念館，把很多建築工人招了，蓋好之後就要把他們趕走。這些人沒有地方住，都市貧民工作的人就組織他們留下來在當地扎根。他們不僅住下來，住下來以後要搭起棚子，雖然很簡陋但至少有個屋頂，還在住的地方附近種些蔬菜和水果。當然他們的生活很困難，水都要從外面來。做都市貧民工作的人就組織他們就地作各種鬥爭，每一個地方的鬥爭對參加的人都是訓練，在鬥爭中他們就變成很堅定地要走這一條革命的路的人。菲律賓有組織的運動和美國鬆散的運動的差別是菲律賓有共產黨，而且是反修正主義的共產黨。領導他們鬥爭的黨不要跟蘇聯走，沒有什麼「和平共存」這件事，因為我們是受壓迫者。他們黨的領導是非常明確的，幾乎每一個群眾組織的人進來都要看一本書，這本書就是從農人、工人等等受壓迫

階級立場寫的菲律賓歷史，講菲律賓怎麼樣先被西班牙殖民，後來被美國殖民。所以參加群眾組織的人都有相當高的認識，然後繼續學習，還做批評和自我批評來促進大家進步。

1997年我到了巴西，巴西還沒有成立共產黨，可是他們也是從過去多年的鬥爭裡認識到毛澤東的路是唯一的路，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影響。他們的做法跟菲律賓相似，但是規模小多了，他們也有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婦女組織、原住民組織……但沒有菲律賓那麼大，人沒有那麼多，可是都還在向那邊發展。所以看得出來，假如沒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事是不可能繼續的。他們邀請我去巴西演講，一共去了四個地方。有一個工人區地方跟現在菲律賓的都市平民區有點相像，住在那裡的人也是以前的建築工人，房子改好了，官方就要把他們趕走。可是這些人就在當地蓋起房子來了，他們蓋的房子非常簡陋可是卻非常堅固的水泥房，比菲律賓的茅草屋好太多了。他們一邊蓋房，一邊跟官方鬥爭，其間被官方殺死了兩個人。這個社區有一個小孩兒的唱歌隊，戴著紅領巾唱進步歌曲。我去這個社區參觀，他們對我熱烈歡迎，就好像我把毛主席一起請了過了來了一樣的歡迎。他們鬥爭的方式也非常有技巧，很不一樣的是他們也受到一般大眾的支持，公共汽車的司機罷工就受到當地的市民支持，不會因為罷工交通不方便就反對。

2010年我去阿根廷開會。阿根廷的共產黨是比較大的黨，他們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支持捷運工人罷工，市民抱怨說你們罷工我們上班太困難，我們還要賺錢吃飯啊，最後領導捷運工人罷工的黨員決定捷運繼續運轉，但不收車票了，市民免費坐車，但是捷運公司拿不到錢，最後罷工勝利。阿根廷的原住民為了保證不被從土地上驅趕的鬥爭也是非常有意思，當地人趁著一個假期，帶著很多自己種的菜、開著農機到省會去送給當地居民，這一切的做法都是由黨來領導，黨建立深厚的群眾基礎。可是，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後，阿根廷的政黨又有了新的疑惑，就是以後的路怎麼走。所以中國往哪個方向走影響到整個世界的革命方向、革命的可能性。他們現在很清楚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了，而且他們看不到任何可以迴轉的餘地。

好的，我先講到這裡，等下再討論，現在先請大家發言。

## 我的社會主義經驗

**杜繼平** | 我們原來主談人的部分都已經談完了，接下來就是討論的部分。討論開始之前我們要跟大家講，我們很高興也很難得地遇到大陸知名左翼現實主義作家曹征路先生特地來台灣，我們就請他來參與這個座談會，趁這難得的機會讓他發表一下他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和看法。他剛好是1949年生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齡人，所以整個六十多年來他全程經歷了。所以我就想請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生活和他經歷的這些時期，這樣能夠以最生動的、最真實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曹先生他當過知青下過鄉，然後當過兵，退伍以後又到工廠工作過，當過機關幹部……他的經歷是很豐富的，毛澤東講「工農商學兵」，他大概除了「商」之外全都經歷了。歡迎他來發表！

**曹征路** | 大家早上好。我本人，像剛才說的，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六十八年的經歷，可以說經歷了共和國全部曲折、苦難、輝煌的歷史。因此，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經歷，應該說是比較有發言權。剛才杜繼平先生介紹我是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下過鄉當過農民，進過部隊當過兵，當時是做真正的戰士，不是那種學校裡的學生兵，真的是在基層摸爬滾打的戰士。退役以後，因為當時有政策，又回到了農村，再從農村被招工進了工廠當工人，然後做了機關幹部。因為創作上的原因逐漸走上專業作家的道路，最後又做了近二十年的大學教授一直到退休。所以這段經歷算是比較完整的。

作為個人經歷，我的大致情況是這樣。我的父親是1936年從上海跑到延安的小知識分子，然後就參加了革命，參加了共產黨；我的母親抗日戰爭



airiti

之後在蘇北的新四軍根據地參加了革命。很不幸的是，革命勝利了以後、解放以後我的父親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從此父母離異，變成單親家庭。他們就我一個孩子，我跟著母親長大，可以說革命的成果我是一點都沒享受到。我父母的經歷呢，在中國大陸應該算是「革命幹部家庭」，但實際上我是比最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待遇都不如。可以說六〇年代初的大飢餓我是完全經歷過了，我自己種過小麥，種過白薯，下河扳過蝦——用一種三角形的網，河水流過去以後再把網提起來，小魚小蝦就留下來。所以這些最基層的工農的苦楚，我都是經歷過的。我母親說起來也是個「老革命」，雖然我那時候跟著母親過，父母離婚了，但我們的家庭生活也是一樣。我說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即使是在那樣的困難的時期，大家都吃不飽飯的時候，作為我媽媽那樣一個十七級的幹部，在中共的幹部序列中應該是縣長的待遇了，但像我家的生活條件也依然是要靠節衣縮食才能夠維持。

很多人諷刺文革，說中國要糧票、布票是物質短缺的表現，我要跟大家說，如果中國那樣一個眾多人口的條件下，在外部封鎖內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條件下，沒有糧票、布票會是什麼情形？可以說類似蔣介石統治那麼多年



airiti

期間賣兒賣女的情況一定會出現。但是在新中國困難的條件下，那種情況沒有出現過。再高級的幹部，你家裡也得憑糧票去買米吃，有再多的錢，對不起，你買不到更好的生活待遇。一直到了1962年稍微寬鬆的時候，各地出現了高級飯莊，也就是只有有錢人可以進高級飯莊去花高價買東西吃。當時有錢人有幾種，一種是高級幹部，一種是外國友人、外國專家，還有一種是資本家，被社會主義改造後可以吃利息的這麼一些人。中國大陸這種情況呢，就是你吃得不是很好，吃得不是很飽，但是可以保證你餓不死。大家想一下這種狀態是不是叫作「共有」，是不是叫作「平等」？在中國這樣一個一百七十多年來一直受壓迫受欺負的貧弱的民族裡，要維持六億人口的溫飽，可以說是相當的困難，任何一級政府都是竭盡了全力。所以，作為我個人的經歷，我是把這種平等的觀念看作我最高的價值評判尺度。你再有本事，再有輝煌的歷史，再有眾多的鈔票，在我看來你都跟我是同樣的人。我不認為你的人格比我更完美，也不認為你的身世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所以平等的觀念、普通老百姓的觀念，是我最重要的評判是非的標準。這是我說的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是關於社會主義記憶。首先是生產關係，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是誰在支配生產資料，在為集體創造福祉的關係。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剛剛從部隊回去，半年以後招工進了一家公司的勞動工資部門工作。有一天我看到做調配工作的科長跟一個女工在吵架，他罵這個女工：「你還要真不要臉！」當時我聽得非常憤怒，想你這個科長怎麼可以這樣罵人呢，後來這個科長下班後就把我拉過去給我解釋。「你不知道，這個女工已經在我們這裡調了三次工作了，每到一個單位都跟周圍的工人搞不好關係，到處吵架，還反過來認為我們對她不照顧，因為她離婚了，是個單親母親。所以她就認為你這個企業應該裡所應當地給她特殊待遇。」我就說你給她什麼照顧呢？他說她原來是個車工，覺得站車床那裡累，後來我們就給她調整了工作，讓她當庫工，就是看倉庫的人。後來她又不滿意，她說庫工要三班倒，要值夜班，我不行。然後她又跑到這個地方來吵，要給她安排到工廠的外面看大門，我們又安排了。但她又跟看大門的警衛班的班長吵架，說這個班長對她不照

顧。這個調配科長就跟我說，你讓我們怎麼辦？

我說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即使是這樣一個工人，幹部對她只有照顧的義務，沒有欺負她的權力。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如果你不照顧她或是罵她就是你不對，所以這個科長向我這個新參加工作的人做檢討，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那個時候的生產關係首先是個主人翁的地位，這是工人以主人翁對社會發言的態度，我就是社會主人翁，你們做幹部的就是為我服務的，她是認為理所當然。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任何一個企業裡面都不可能出現，稍微有點臉色那你就掰掰了。

第二是社會關係，人與人之間沒有「我就比你高一等」這種理所當然的邏輯。也可以舉個小例子，很多輿論都認為文革時候大家不能說、不敢說，人人自危。其實我告訴大家，用列寧的話講：「革命是人民大眾的狂歡日。」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興高采烈，天天在過節一樣。實際上那時候普通人跟幹部的差距還是有的，但他們覺得自己跟幹部是人格平等的，覺得揚眉吐氣，所以他們是敢說話的。我說的這個例子是一個解放前照相館的小老闆，算個小地主，他對文化大革命時候宣傳隊天天敲著鑼鼓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很反感。那是很大的鑼鼓啊，又是敲又是喊的，天天在大馬路上轉悠，「你好就好就是了，天天擾民幹什麼？」他那時候喊我「小鬼」，我們是鄰居，然後他就跟我講：「小鬼，不長了，你看他天天喊『就是好！』就是搞不長了，看來老毛有問題了。」他把毛澤東叫「老毛」，他那時候就敢說這個話，並不是像後來人描寫的，特別是像知識分子描寫的你只要說了犯忌諱的話就要勞改了，馬上要把你抓去什麼的。當然個別人挾嫌報復、打小報告、告黑狀的是有，但對於多數人來說，他沒有什麼顧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平等和放鬆的。

是非善惡的價值評判標準在那個時代也是同一的。比如說那時候姑娘談戀愛的對象首選是解放軍，其次是幹部子弟，再其次是工人，地主資本家的後代呢則是最後選擇，除非特別愛錢。這個是客觀存在，因為那個時候地主資本家被認為是剝削階級，所以做這種選擇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什麼人是美的，什麼人是醜的？這個人會勞動，這個人的技術好，大家尊敬他。絕對

沒有說這個人的爸爸是個有錢人大家佩服他，大家只是覺得你略有錢也是可以。他爸爸是幹部，大家都願意相信他，但馬上就會想到，我這個身分去他家做兒媳婦會是什麼待遇呢，恐怕日子也不會好過。那個時候有這些考慮。

在工廠裡的工友們會不會有競爭呢？一樣會有的。但不會說是因為你爬上去了，我就下降了，不是競爭這個。競爭的是每個月評先進的名額，只有兩個人可以當「先進標兵」，當「先進標兵」的時候可以有五塊錢的保健票——五塊錢可以多買很多吃的。在這個差別中間也會產生矛盾，但這個矛盾跟今天比起來根本不算個事。背後打小報告、捅黑拳的有沒有呢？有，品質不好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有。但是一般來說喜歡在背後搗鼓別人、喜歡打小報告的人都是被別人看不起的，別人會說你這是不光彩的行為，一說起某人，「誒喲，那個人就喜歡背後嚼舌根子，大家都不大喜歡」。我剛才說的剛參加工作看到的那個女工，科長就訓她有這個毛病，到了哪個單位就喜歡議論別人，所以哪個單位都不喜歡她。所以那個時代的工廠也好，農村也好，大體上是這樣一種標準。

還有關於上山下鄉。我剛到農村的時候，到農民家裡去吃派飯。就是幾個年輕人集體去農民家裡搭伙，生產隊給一些補貼，基本上一個村莊每一家都要輪流做飯。因為那時候農民很苦，我當時插隊在的那個農村在當地基本上算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為什麼要去那裡呢？那時候年輕、衝動，覺得我們要改天換地去了，去縮小「三大差別」了，要選最窮的地方去改變。有一天我們在山上挖地刨荒的時候，一個農民很驕傲地跟大家宣布：「今天我燒鍋的，請大家吃魚過癮啊！」她到她娘家那裡除了條魚，那時候年終分紅才有現錢啊，拿不到現錢就不能到市場去買東西給大家吃，怎麼辦呢，她到她娘家除一條魚。她娘家那個地方是圩區，我們插隊的那個地方是半山區，要跑六十里路到她娘家除一條魚，天不亮就走了。晚上收工的時候我們到她家吃飯的時候，小孩子活蹦亂跳的，「要吃好東西了！」她跑了一百二十里把這條魚拿回來燒給我們吃。一個大洗臉盆，滿滿一盆燉得雪白的魚湯，上面撒得蔥花，「吃啊吃啊吃啊！你們都別做客啊！」那個筷子一插進去馬上就覺得腥得不得了。很奇怪啊，那是冬天很新鮮的魚，做的魚湯熬得雪白的為什麼這

麼腥呢？不理解。這個跑了一百二十里的農婦非常不好意思，大腿一拍馬上又衝出去，過了一會兒從別人家用湯勺托來了一勺豬油，然後把豬油放在湯裡面。豬油一化開，馬上滿屋子都是魚香。其實它就是少這麼一點點油。

所以農民家的困苦就困苦到這個程度，但是她對我們這些「城裡人」應該說是掏了心窩子。這個女主人當年多大歲數呢，三十六歲不到，已經是六個孩子的母親。大家想一下，現在的三十六歲那正是風華正茂、漂亮的時候，但是我們當時看到她，滿臉的皺紋啊。她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呢，後來我們才知道，她是解放的時候鄉裡的團支部書記，演過《白毛女》裡面的喜兒。她前年去世了。那個時代人和人的關係就是這樣，非常淳樸，不圖任何回報的關愛，用今天的話講「大愛」——現在的「大愛」就是為了掙你的錢，那個時代不是這樣的。她看到「城裡人」也會羨慕，抓著女知青的手，「這麼嫩啊！真是好看啊！」她的手就粗糙得像樹根一樣。看到戴眼鏡的女孩子，「誼喲真了不起！」她認為戴眼鏡是一種學問，「有學問真是好啊！」羨慕得不得了。這就是城鄉差別，她們在農村裡享受不到這些東西，她年輕的時候得不到這些東西，所以她對「城裡人」、那時候的下鄉知青是非常熱情的。後來大陸所謂一些「傷痕文學」描寫的農村人那麼可惡，那麼欺壓知識青年，甚至姦汙女知青……我不能說這個絕對沒有，但是它肯定不是在初期，它是在後期的七〇年代以後。因為要推薦知識青年上大學了，要推薦他們招工了，這個時候農村的一些少數幹部手上又有了權力了，所以他們覺得對知青可以濫用這個權力，才會出現一些醜惡現象。但那也是極個別的，即便到七〇年代也是極個別的。

我的基本經驗是，改革開放是以一種非法的政治政變展開的。作為我這樣一個普通人，我們對上層統治者的情況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作為一個年輕人，對於理想狀態的追求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都是一樣的。我們那個時候對單位的領導也不滿，對工廠的管理也不滿，希望改革。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改革是朝這個方向，也許它開始的出發點是好的，到了後來就離開社會主義越來越遠，這也是首先體現在生產關係上。在今天的大陸，可以說所有



airiti

的單位、企事業單位，基本上都是僱傭關係了。以前的公有制下，人與人平等、共同享有國家財富的感覺，已經完全沒有了。什麼叫社會主義？它就是生產資料的全社會所有成員共同占有，全社會成員對勞動成果的共同享有，這叫社會主義嘛。大家都有這份生產資料，產生的勞動果實大家都可以享受，這個叫社會主義。可是改革開放以後這些東西不存在了。

起初我對改革是非常期望的，否則我不會跑到深圳的，因為深圳是改革的前沿，希望在那裡能夠找到新鮮的經驗，能夠找到制度改變和能夠對人的解放產生更積極的影響的經驗。起初我是辦一份雜誌，這個雜誌就叫《闖世界》，年輕人嘛，闖世界。在這個辦雜誌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讓我震驚的事情，比如說我看到農村的姑娘到深圳來打工，睡在硬紙殼（台灣叫「紙板」）上，身上蓋著編織袋，剛去城市的時候就這種情況。我也看到了企業的老闆是怎麼去侮辱、打罵工人的狀況。特別讓我不能理解的是，原來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的幹部到了深圳以後他對於工人的惡毒勁、凶狠勁，甚至比台灣去的、日本去的老闆還要過分。這個尤其讓我不能理解，社會關係被徹底顛覆了，價值觀念也被徹底顛覆了。在深圳這樣一個地方，朋友圈不是根據你的文化程度、興趣愛好來劃分的，它是以身家多少萬來劃圈子的：你是身家五十萬的，一個圈子；他是身家五十億的，一個圈子；她是身家一個億的，一個圈子……，各個圈子裡都有自己的共同語言，這個社會分層非常鮮明。

隨之而來產生的問題就是：改革究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原來社會主義物質不夠豐富嘛——還是要徹底改變掉社會制度？過去講企業效益不夠好，朱鎔基上台之後發了宏願，說是「減員增效，三年大變」，要把國營企業的問題解決好，結果卻是絕大多數的國營企業消滅掉了。中央直屬的國企五年前還剩一百多家，最近統計是還剩九十七家。一個醫生，你說你有博士學位，你有多少留洋的經歷，你有多少發明的專利，但是你把病人治死了，能說明你醫術高明嗎？恐怕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出這個結論。不能因為你吹牛皮吹得響亮，大家就來請你。所以我的第一個感受就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漫長性、反復性、艱鉅性。今天中國還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大陸有很多爭論，結論也不同，昨天我們在飯桌上還有很多爭論。在我看來實際

airiti

上是個力量對比的問題，等一下會講。

道路漫長、艱鉅、反復，它不僅體現在領導層的組成當中，還體現在全體人民對生活的實際感受當中。比如中國現在大城市裡的年輕人畢業了，沒有出路，一家幾代人的積蓄都買了房子的首付，全家人都為了給銀行付利息在奮鬥。即使是中產階級，收入條件比較好的也要承受越來越重的孩子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負擔。這樣一來，我們原來對於社會主義的美好的想像就逐漸地被打碎了。我所在的學校是師範學院，每年的統計說就業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幾，但實際上能夠達到百分之二十就已經很不錯了。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深圳本地的幼兒園、中小學在編的教師崗位早已經滿了；第二，民間辦的教育機構裡面，給的待遇非常低，甚至帶有歧視性，這些孩子又不願意去。於是就造就了大量學校畢業的同學留在了家庭裡，大陸有一個詞叫「啃老」，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反正就這麼混唄！」這種情況相當普遍。我們那邊有個藝術學院，幾乎百分之百的同學畢業以後找不到事情做。本來大家都以為進了藝術學院，可以一舉成名，可以掙大錢，實際上他就找了個替身的工作，替人家出一次場也不過就賺個百八十塊錢。一般學這些的家庭條件都還不錯，他怎麼能受得了這個苦啊，還不如農民工跑到橫店睡馬路還可以當群眾演員掙點錢，人家吃得了這個苦啊，你這些學生哪兒吃得了苦呢。

第五，談一談我的一些思考。首先我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它的理論設計是不是有缺陷，這個我有懷疑。共產主義運動的理由、它的過程、它必然經歷的困難，馬克思、列寧都想得很周到，但是當你奪取了政權以後，你怎麼樣保證你這個政權不變顏色？你怎麼樣保證你的革命者不重新變成壓迫者？或者你的後代能怎麼樣繼承你的理想？這個思考是不足的。特別是第一代革命者的後代，就必然或者說絕大多數都成為了壓迫者。中國今天的頂級富豪，不是大家聽到的什麼馬雲啊、馬化騰啊這些人，頂級的富豪是誰呢，就是鄧小平家族、江澤民家族、廣東的葉劍英家族，包括現在在台上的某些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權力以後一旦在理論上出現了顛覆，就一定會導致它的退化變質，而他們退化變質的最後又是全面

airiti

地投降，全面地改旗易幟，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他們的財產就能夠合法化。

所以今天最希望社會主義中國垮台的人是誰呀？不是什麼民族資本家，也不是什麼所謂的知識菁英，他們都是一廂情願地拍馬屁的人，真正真想改旗易幟的人就是在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崗位上獲得了不義之財的人。那麼這個不義之財是什麼時候開始公開合法化的呢？1998年，當時的總書記叫江澤民，到廣州參加一個活動，他提出了一個口號叫「悶聲發大財」。什麼叫「悶聲發大財」呢，就是你拼命地撈錢，不要講就是了。這是公開地鼓勵幹部貪汙，那麼當然大家心領神會，「悶聲發財」就可以了。這個口子一開，全國就迅速地進入了「撈錢」的氛圍中。他為什麼要開這個口子？因為鄧小平有句話，就是「誰不堅持改革開放，誰就要下台」，他不能下台，所以他放手讓大家貪汙。反正要幹大家一起幹，要黑大家一起黑，就變成這樣一種狀態。

那麼是不是所有的幹部都幹了這種事呢？我也告訴大家，不是的。廉潔奉公、堅持兩袖清風的幹部也大有人在，只是他們在官場上很孤立，甚至呆不下去。我親眼見過一件事就是深圳龍崗區區委有一次開會，我去採訪，正好行賄的來了。區委、常委十來個人在一個長條的寫字台兩邊，行賄的人就拿著旅行箱，把那箱蓋子一打開，一萬塊錢一捆，撒了一桌子。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我說你們敢這樣幹啊？！他們說：「小意思啦，濕濕碎啦（廣東話：小意思）！」然後往我包裡塞錢，那我當然也不客氣嘛，我不拿他就攆我走啊，後面的節目進行不下去啊！但這個風氣一開，這個口子一開，就完全收不住了。我們學校一個校長，是國務院培養的重點的接班人，出事的時候才四十二歲。他是一個留美的博士，搞高分子材料的，到了我們學校當副校長。教育部指定他要參加黨委班子、做副校長什麼的，都認為他是前途無量的一個人，才兩年時間就貪汙了兩千萬。後來把他調到廣州去當一個大學的校長，本來想把這個事情遮蓋掉，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又暴露出來了。沒辦法擺到桌面上來處理，就又把他的押解回我們學校，學校沒辦法，人家沒飯吃了總要找個事情給他做啊，就讓他坐實驗室裡看實驗室——這些優秀的人才也毀掉了。

airiti

這樣悲哀的事情發生了很多，所以在共產黨內部、在人民群眾內部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反彈。我不清楚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幾年持續出現了「毛澤東熱」，大街小巷、城鄉生活甚至出租車上，到處都在貼毛主席像，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紀念毛澤東。普通老百姓對毛澤東肯定不可能有什麼深刻的認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呢？這是表達一種政治立場，表達一種政治選擇，表達一種政治態度，我是這樣理解的。這個持續的毛澤東熱又非常有意思地遭到了各級地方政府的彈壓，不斷找出各種藉口做出比如拆除毛主席像、拆除毛主席私人的紀念館、博物館啊等等行為。鬥爭就顯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複雜。經常看到那些討薪的、紀念毛澤東的人被關到牢裡去，然後各種左派的網站又把他們的事情披露出來，對當地政府進行譴責。反正鬥來鬥去吧，事情越演越烈。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們共產主義運動理論設計上沒有解決這個革命徹底性的問題，所以導致了道路的反復、複雜、艱鉅。當然，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翼的中堅分子自身有沒有問題呢？我也認為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結果競相變成了「誰背原著背得順溜，誰能比別人表現得更革命，誰就更有理」。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已經有很沉痛的教訓，造成了大量的共產黨員的犧牲。在文革後的七〇年代的日本也有過類似的教訓，當時日本的左翼學生仿照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搞過一次政治運動，規模不小，取得了當地民眾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日本的右翼政府上台之後對他們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他們就學著毛澤東的樣子拿起了武器跑到北海道的山裡面躲起來打游擊。照說你是個左派人士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在少數派抗爭強權的情況下，你應該更團結才對呀，不是，這些左派們進了深山以後互相懷疑，指責對方不夠革命，「我才是真正徹底的革命者！」然後用行刑逼供的方法把他們懷疑的左翼運動的積極分子打死了七個人，這個事情後來披露到日本社會以後，使日本的左翼運動迅速地垮台，沒有人再相信你的左翼運動。你的左翼運動最後就搞成這樣一個結果啊，你們究竟要幹什麼？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在馬列主義理論不徹底的基礎上，大家提出的質疑

airiti

有什麼？當初工人農民跟著你們這群革命領袖幹革命，難道就是讓你們代替蔣介石、代替袁世凱代替實行老佛爺嗎？我們提著腦袋跟著你們幹革命，最後的結果就是讓你們重新當老爺嗎？那麼怎麼樣從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很有可能在下一次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時候才能真正解決。現在我從理論上、從實踐上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在未來實踐中解決。

怎麼樣去限制這些革命者或者是革命者的下一代他們不變色？比如，中國一個共產黨的領袖陳毅是個元帥，他的兒子叫陳小魯，自己不但投靠了一個資本財團，而且做了許多非常壞的事情。前幾年他還代表紅衛兵向全社會道歉，要向受害的人檢討，實際上完全是在演戲，在幫助資產階級奪回話語權，讓人們更加痛恨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他有什麼資格來代表紅衛兵？他在文革中就是打砸搶的典型人物啊，當時北京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就是他們這些人，他們叫「聯動」，什麼叫「聯動」啊？這個名稱說起來匪夷所思，它叫「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人大常務委員會幹部子弟行動委員會」，這個什麼中共中央、國務院跟你有個屁關係啊？你也不過是爸爸、媽媽在那裡面上班嘛，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啊？他們就居然敢做這樣的事，穿著大馬靴，騎著自行車、摩托車在街上隨便抓人，私設牢房，打罵那些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一般工農家庭的子女甚至是家庭成分不太好的子女，就像我這樣父親是右派的家庭子女，是絕對不可能有這個膽量的。什麼樣的人有膽量打人啊？什麼樣的人可以違法亂紀啊？那就是社會地位優越的人他才能這樣做啊。受到壓抑的人，抬不起頭來的人，他怎麼敢這樣做呢？

陳小魯這樣的人他居然敢把邏輯顛倒過來，說是文革期間全體打人的紅衛兵，他來替他們來道歉，他們自己做的惡，他自己不承擔責任，要全體的紅衛兵替他來買單，這個人不是荒謬到極點嘛？！所以後來有記者採訪他，說如果陳毅元帥還在世，他會認為你們今天這樣做是對的嗎？他嘟嘟囔囔講了半天：「那恐怕他是不答應的。」我是在電視節目裡看到他的。是啊，你爸爸當年那樣子拋頭顱灑熱血，紅軍長征以後他因為負了傷不能走，腿上一顆子彈，把自己的腿用皮帶綁在樹上，找一個人來，把子彈擠出來，忍受這樣的痛苦來堅持革命。所以他怎麼能夠容忍你們今天把這個國家改變顏色



airiti

了？我相信他爸爸在世的時候就一槍斃了他，要這個兒子有什麼用？所以毛澤東在文革的時候就說過一句話，「幹部子弟是一個禍害」，一點不假。中國大陸今天走到這一步，可以說跟這些幹部子弟、高幹子弟的作為和他們的社會影響，有著極大關係。按照美國駐華參贊的一個報告分析說：「決定中國命運的就是五百個家庭」，就這五百個人，沒有多少人，他們在左右中國的政策。今天的嚴重情況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除了理論設計上的缺陷和左翼運動者本身的缺陷之外，還有一個缺陷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缺陷。中國儒家設計的傳統文化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兩千多年形成的文官制度給中國的士大夫造成了很多的幻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基本上是按照這個邏輯在想像世界的。18世紀之後英國的文官制度也仿照中國的儒家學說來打造，所以他們說的「現代性」恰恰就是我們一千多年前的「現代性」。那麼這就帶來一種官僚文化，他們打造了一個幻覺叫「從道不從君」，意思就是知識分子是可以制約皇帝的。辛亥革命不徹底，其中有一條就是知識分子在宣傳「如果慈禧太后在晚清時期能夠溫和地改良，中國的現代化要快得多，進步比今天大得多」，所以叫「革命黨不如維新黨，維新黨不如洋務黨，洋務黨不如保皇黨，保皇黨不如慈禧老佛爺」。那麼這樣一種邏輯呢，在中國的知識界成為了一種知識，在中國的高校甚至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凡是你同意這樣一種觀念的，大家就會認為這個人講話比較中規中矩，「他是知識分子！」所以按照毛澤東的評價，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總是在強調「剝削有理，壓迫有理」，「革命沒有理，造反沒有理」，我們今天就要把這個道理顛倒過來，叫作「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最後說一點我對未來的展望。我個人認為，社會主義道路是必然要進行下去的人類行動，它不會因為領導人暫時的得失，也不會因為左右之爭而改變，原因就在於這條道路它是光明的選擇。人天生就要追求平等，誰都不願意受壓迫，誰都希望和別人公平，這是人的天性，這個道理是不可泯滅的，在任何時代都是同樣。當革命來的時候，大家歡呼，大家積極參加；革命遇到了低潮的時候，會不會改變這個規律呢，我認為不會改變，只不過時間有

airiti

長短，過程有反復，痛苦有增加。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裡，在毛澤東反復強調的、不斷成熟的思想體系裡，最終它站到了人民的圖騰裡。毛澤東最後的思想昇華，就不斷地認為歷史是由人民來推動的；不斷認為人民是水，共產黨是魚；不斷認為人民是父母，我們應該尊敬父母；不斷認為共產黨像種子，人民像土地，到了哪裡都要跟土地結合，生根開花，而且認為「春風楊柳萬千條，萬億神州盡舜堯」。舜、堯是中國最賢能的領頭人，這個領頭人是誰呢，是六億人民。他相信人民，他不相信少數人，不相信任何菁英，不相信英雄創造歷史，而相信人民創造歷史。

說到這裡呢，我就要扯到昨天晚上的辯論了，某些朋友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是資產階級專政了，領導人已經變成資產階級了，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前途了，走不下去了，要進行「第二次革命」不知道要多少年了。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我相信人民，我相信毛澤東仍然是對的。從共產黨的歷史上看，領袖人物或者說領導層出了叛徒，出了錯誤，可以說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的大部分時期，從1929年到1949年，將近有二十年時間都是錯誤的人在當領導。毛澤東真正當了領導是七大以後，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毛澤東本人受到過多次排斥，多次被撤職，多次被處分，甚至把他放到了偏僻的山村裡面去。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現在什麼事都沒有了，每天幹什麼呢，吃飯睡覺拉屎。」他只能做這種事了，但是他有沒有喪失信心啊？沒有。他依然相信人民還會要革命，所以他那個時候在病重的情況下依然到鄉下去搞調查研究，去寫報告，甚至他的老婆賀子珍在那個時候對他都失去了信心。他只好央求一個路過的通訊員把他寫的報告遞到中央去。

所以我的看法是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上看，還是從我們國家目前的實際力量對比上看，這場鬥爭並沒有完結。不是說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他們已經要專政了，他們已經要專政我就出不來了，我早就被抓進去了。早就有人在宣布要「逐毛殺左」，我被認為是左派。其實我從來不同意左右這個分法的，我不認為左派和右派能夠概括今天的思想狀況。如果要我概括我寧願說社會主義道路派和資本

airiti

主義道路派，因為左右這個說法非常含糊，這個扯遠了。今天中國的力量對比，確實相當部分的幹部是要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但是為什麼我要說這個力量的對比他們還不占上風呢，因為道理很簡單：他不敢公開說這個話。他們心裡早就撓得癢癢的了，他們家裡的錢不能公開啊，因為在任何國家小偷和強盜都是要受到司法處分的，任何一個國家出賣自己民族國家的利益都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心裡非常清楚，所以他巴不得馬上就變天，巴不得馬上改旗易幟。他為什麼不敢？因為他不占大多數。即使到了今天，他們非常猖狂的情況下，在媒體上、在網路上、在私下裡，他可以拼命地、惡毒地去攻擊社會主義，攻擊毛澤東的情況下，他也不敢亮出這個心。

我們有個系主任曾經跟我辯論，說世界上四大惡人是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我說你別跟我扯這些東西，你敢不敢到校園裡舉著旗子說這四大惡人？宣布打到共產黨？你要是敢，我今天佩服你，你算一條漢子，他馬上慫掉了啊，為什麼？因為他知道他不得人心。這就是力量的對比，經過文化大革命，老百姓的眼睛雪亮的。你別以為他們為了眼前的一點利益害怕你，怕你扣他獎金，怕你給他考評的時候打不及格，那是表面的東西，他心裡面非常清楚你們是要幹什麼。他要跟我辯論，我說辯論是有前提的，是為這個國家好，在這個前提下我才有可能跟你辯論，他說什麼叫「為國家好」？我說，第一是主權獨立，第二是民族團結，第三是人民生活安定。至於這個國家要走什麼道路，這個可以商談，你走資本主義道路也行，我認為我們可以辯論。如果你不是為這個國家好，我跟你還有什麼共同語言，我跟你辯論什麼？你就是我的敵人嘛。他聽我這樣講完以後馬上灰溜溜地跑掉了，再也不來，不敢跟我辯。他是我的系主任，他也是共產黨啊，我也是共產黨，我為什麼有這個底氣，就因為我知道我占著理，我這套說法多數人是擁護的。他也知道他那套說法不敢公開，他只不過是私下裡爭取人心，不敢亮出旗幟。他亮出旗幟的話我要為你叫好，像茅于軾那樣子，他公開講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我就是反對社會主義，那你還不錯。如果你只能幹這種偷偷摸摸的事情，說明你力量小嘛，以上是第一，力量對比。

第二，從實踐上看，我剛才說「毛澤東熱」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越來越

熱，說明民心在變，幾十年來的欺騙已經欺騙不下去了。

第三，今天的中共中央有了一點點轉折的變化，就是最近的十九大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出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大家知道共產黨是非常注重理論建設的，對每個歷史階段主要矛盾的判斷決定了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個表述是各國共產黨都非常重視的一個哲學基礎。今天的哲學基礎變了，以往是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矛盾」，今天變成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不均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它裡面的說法究竟有怎樣的含義，我們不管它，它為什麼要改變？因為它知道以往的那個東西持續不下去了，以往的表述是把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人對物質的無限制的欲望上，「日益增長」就是「日益增長」的欲望嘛。人的欲望能不能滿足呢，永遠滿足不了，從邏輯上說，這本來就是荒謬的。有一句話叫作「地球可以滿足我們所有人的需要，可是它承載不了人類的貪欲」，從邏輯上說它永遠滿足不了，今天它已經被理直氣壯地改過來了。儘管今後我相信「打左燈向右轉」、「說一套做一套」、「陽一套陰一套」這種情況還會存在，儘管叛國者、叛黨者還會得勢，道路還會曲折、還會漫長，但是我相信這個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就說這麼多。

## 10月22日現場討論

**杜繼平** | 謝謝曹先生這麼精彩，又這麼生動、這麼有思考深度的分享。我想大家從他剛剛的敘述、分析裡面能夠感受到他為人的真誠，以及他對國家民族的關切和思考。今天他能夠來到這兒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和想法，我覺得真是非常非常難得。我想在座聽眾也能感覺到收穫非常的豐盛，這是很好的一次聚會。現在進入討論環節，先請金寶瑜教授發言。

**金寶瑜** | 我真的很感謝曹老師跟我們講的這些，使我們能更切身地了解很多事情。我跟曹老師有個同樣的想法，就是一直覺得社會主義是這麼好，所以寫了很多文章向外傳播社會主義的優點。可是我覺得到今天我們不能不說，也不能不想，為什麼走了一半，走到1979年就走不下去了，這個問題不能不回答。我自己有一個解釋，不是很成熟的想法，可是希望可以看看大家能不能從這方面想一想。我記得好多年前，美國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寫了一篇文章，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根本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一定是到生產發展非常高的程度才叫社會主義，所以蘇聯根本不是。他文章裡連中國提都沒提。我跟陽和平還有我女兒一起寫了一封讀者投書給他們，說你不能不承認有一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成功了，為大家帶來這麼多幸福。但你居然說沒有，好像根本不可能、不存在。一定要說生產力一定要發展到一個程度才可以革命，可是在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生產力就是不能發展，難道即使革命條件成熟也不准革命？

所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很有道理，「新民主主義論」是說中國還有





其他被殖民的國家和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發展不了資本主義，不是說不要發展資本主義，而是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發展也就因此沒有一個強的資產階級存在，因此民主革命必須要無產階級來領導。我記得1979年回大陸看到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時期真是大量地和快速地發展。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辯論是農村要不要集體化，毛主席的想法是要繼續改變生產關係才能發展生產力，這真正是對的。

中國大陸農村在人民公社成立後的發展真的是沒有任何落後國家可以比得上的。我去的一個人民公社，整個的灌溉系統就是要花很多的勞動力來平整土地，包括剷去小山坡和填滿小水溝，才能把零碎的土地連成一大片來用農機耕種，並且在農地的兩旁建了電力灌溉和排水的管道。在這種情勢下生產有太大的發展，同時農村發展了很多人民公社和大隊所有的工業。

中國「變修」，不是因為生產力沒有發展，而是因為生產力發展了。這句話怎麼講呢，就是我覺得社會主義裡邊有資本主義的因素，毛澤東一直憂慮的問題就是怎麼把兩種所有制合併為一種。一種是工業，國家所有；另一種，農村是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裡要發展工業，就使得資本主義的因素

發展起來。國家規定集體制的工業收入有百分之四十要支持農業，再拿一部分錢來支持福利；但是集體企業的工廠並不想這樣做，他們要的企業更快地發展，就要把所有賺的錢再投資去發展工業，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些集體的工業在社會主義環境下它不敢做什麼，但它是會支持鄧小平的路線的。我們當時去看一個燈泡生產廠，當初建廠時借了四間房子在進行生產，後來生產大幅擴大，到1979年時，品種有霓虹燈、汽車車燈，各種各樣的燈泡都生產。這個工廠的要求就是把市場擴大，那麼它的資本就可以擴大，但國家有限制。到了鄧小平的政策，改革開放了馬上就有香港人來，跟它訂聖誕節的燈，它當然很高興。

我們一定要看到當今中共的資本主義路線，從開始就是有資本在後面支持著。我覺得所謂集體是大私有，就是這些東西是屬於這一群人的，不管是大隊還是公社所有的，他們還是要照顧自己的利益為先。所以現在追求鄧小平路線的，不是說這個人還是那個人，要從物質基礎看。昨天談的和今天談的都比較注重上層建築，即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文化上的爭執。我認為我們還得更多地注意經濟基礎裡，因為社會主義時期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存在，資本要求積累、向外發展、不願意受限制，所以我們應該承認。我不覺得在生產力發展低的國家，一定要生產力發展起來我們才革命，但是革命之後所面對的生產力低，在實行公有制時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所以我認為假如是評論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話，我不認為只是說他這個人代表什麼東西，這個人是不是好人？他的說話裡是否有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意思？而是說現在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支持資本的，因此是受資本的支持的。我絕對同意曹老師的是說，中國大多數人民都不要走這條路，因為他們在這條路上沒有得到任何利益，而得到利益的人絕對不願意放棄這條路。我覺得這是相當嚴重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對未來是堅決地抱有信心，我對中國未來要走的道路、世界要走的道路都是抱有極大的信心的。不走這條路這個地球就毀滅了，沒有人了，沒有人可以存在了。可是我們要看到當初走社會主義道路日子裡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因素實際上是存在的，我們要看到支持今天政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中國的資本包括所謂的國營企業，在中國的資

airiti

本是龐大的，因此不止是幾個貪官汙吏或者是鄧小平、江澤民以及他們的後代。所以問題不只是幾個人的問題。我們當然要跟這些力量抗爭，但到目前還看不出可以和平解決的方式，未來會有怎麼樣的方法我們也還不知道，要看未來的發展。

**杜繼平** | 謝謝寶瑜，剛才講到中國大陸現在的資本，它現在已經不單單是國內的資本了，更重要的是它跟國際資本之間的勾結或者合作，是非常龐大的共同利益，所以這個問題就更複雜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從來就是世界的問題，我一直說大家要從國際視角看問題，中國未來的發展實際上對整個人類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中國大陸現在是全世界唯一的、毛澤東思想在民眾、幹部、黨員中仍然有相當強大影響的地方，所以它仍是最有可能或者說有很大的潛力去重建社會主義的地方，因而可能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最大的動力。所以大陸的變化不止是中國本身的問題，它事關整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聯繫到台灣本身，又對中國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為什麼？因為兩岸關係、統一問題是中國一個核心的問題，所以大家不要以為你在台灣自己鬧、胡搞瞎搞沒有關係，這些真的會影響到整個中國的未來發展。台灣雖然不大，但是從整個中國來看，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習近平他們到今天盡量不願意對台灣動武，為什麼？很重要的原因是涉及到鄧小平路線能不能繼續走下去。一旦發生兩岸的武力衝突，會牽動中國全局，包括國際關係等等。這些往後再談，接下來陳信行跟我們談一談中共革命成功後土地改革的一些歷史的、重要的部分。

**陳信行** | 我是來推銷十七年前我們編的一個小冊子，在我辦公室堆了十七年。2000年的時候我們邀請陽和平的舅舅韓丁(William Hinton, 1919-2004)到台灣訪問，在座其實不少朋友當年都參與了這個活動，也參與了編輯這個冊子。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到台灣之後，我們跟陳映真吃完了歡迎晚宴，他心臟病發了，就到台大醫院動了心臟手術，所以他的台灣經驗基本上就在台大醫院。但是韓丁一直到最後病倒為止，他是一個非常堅決的鬥士，所以我

們當時就把這個冊子取名叫《韓丁，這個老鬥士》。

他在1953年回到美國前，見證了中國土地改革的過程。他本身是康奈爾大學畢業的，理論上跟李登輝是同樣出身的。但是他跟陽和平的爸爸一樣都是康奈爾出身，卻寧願去革命、養牛，也不願意當「人上人」什麼的。他的1947年到1953年間這段經驗後來出了一本書叫《翻身》<sup>1</sup>。當年我到美國去終於接觸到這本書後，對我的啟發非常大。終於有一個具體的情節告訴我：什麼叫自己教育自己，什麼叫「群眾路線」。這之前我們多多少少都聽到過一些口號，「革命不能包辦代替」等等，但是在《翻身》裡面韓丁非常立體地記錄了一個村莊如何進行土地改革。尤其有意思的是，裡面沒有一個幹部是沒有私心雜念的，沒有一個幹部是不曾犯過錯誤的。每個人都犯過各式各樣的錯誤，每個人都是從舊社會裡面出來的。有些人犯錯誤、受批評都受不了；有些人犯錯誤、受批評會改，但是改得不怎麼徹底，下一次他還犯錯誤。所以他所記錄的整個土改的過程是非常活生生的一群在舊社會受壓迫、不會讀書識字的農民怎麼樣在一個恰當的領導之下能夠自己教育自己，並終於把一個小小的村莊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當年尤其感慨的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短暫的農民抗議潮裡，我那時候也常下鄉，現在常講「北藍南綠」——肯定不是這樣子。當時絕大多數台灣農村農民家裡的祖先牌位旁邊會有蔣介石和陳誠的像，會供在廳上。他們對蔣介石是感恩戴德不是平白無故的，幾代人都是佃農，就是這一代被「賞賜」了土地。所以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土改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包辦替代的，是讓農民覺得是從天而降的。辦土改滿足了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對土地的渴望，所以這樣子的黨當然在農民心目中是神明。雖然我們這些反國民黨的人從各個角度來看都覺得當時農民已經受到非常多不公平的待遇，包括進口美國農產品要把台灣農民的生計弄到無法再活下去，當時的抗議主要就是從這點開

---

1 William Hinton. 1966.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文版：韓丁(1980)《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北京出版社。

始。但是動員台灣的農民是非常艱困的，因為這些農民說到底對國民黨、對蔣家是感恩戴德的，這個感恩戴德，在台灣是那麼根深蒂固，這是那個年代農運面對的問題。《翻身》裡韓丁的描寫，給了我一絲希望，原來土地改革可以這樣搞。推而廣之就是我們所推動的任何群眾運動也可以學習這樣子的榜樣——舊社會出身的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可能的。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不止是中國的土地改革經驗，蘇聯的革命經驗裡肯定也留下了大量這樣的事蹟。

韓丁回到美國之後這些材料被扣押，他本人也被起訴，經過了長久的法律鬥爭才把這些材料從FBI要回來，最後寫了《翻身》。之後他也寫了《深翻》<sup>2</sup>、《大回潮》<sup>3</sup>，對於山西那個農村幾十年來的過程做了詳細的描寫。待會兒大家走的時候我們有一疊十七年前為了要配合韓丁來台所複印的小冊子，歡迎大家多帶一些分送給親朋好友。《翻身》這本書，網路上很容易找到，大家有興趣的話請下載來好好地看。我覺得真的是要從這樣的故事裡面來看，類似像這樣具體的人的實踐鬥爭，如何改正各式各樣的錯誤，或者是無法改正各式各樣的錯誤。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比起抽象的理論來講。

也就是在這一點上，當時我們讀了曹征路老師的《民主課》，也覺得是一本為我們帶來希望的書。雖然《民主課》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裡面到後來是挫折的，到後來是迷惘的，但是在這個實踐的過程裡面你可以看到怎麼樣試圖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自己，這裡面有什麼困難，這些課題就是未來我們要改變這個世界的話肯定也要面臨的。

**杜繼平** | 謝謝信行，我再補充說明一下為什麼國民黨來台灣實行「耕者有其田」，孫中山的經濟綱領裡面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就

---

2 William Hinton. 1984.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中文版：韓丁(2008)《深翻：中國的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北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3 William Hinton. 1990.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是要解放佃農，要「耕者有其田」，但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大陸、在蔣介石執政期間一直都沒有實行過，因為他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他沒辦法實際執行。可為什麼到了台灣就幹了呢，因為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就是中共已經取得政權了，中共派到台灣的地下黨組織農民，要求要土地革命，所以他迫於形勢，迫於中共可能隨時攻台解放台灣，取得當時農業社會大多數農民的支持，所以他必須先下手為強，趕快把這個土地問題解決了，要不然啊，台灣左翼的火種就不可能消失了。所以他在大陸沒辦法實行的在台灣就趕快實行，而且台灣的地主階級與國民黨沒有淵源，沒有政治力量，所以他可以放心地搞土地改革，大刀闊斧地做。再者，他的做法也不像中共的土地革命，是比較溫和的，是「贖買」的意味，不是直接沒收地主的土地，甚至像中共一樣發動農民去鬥地主，他是用股票、債券等等補償的方式給地主，讓他們可去投資工商業。所以辜振甫家族才能夠從原來的大地主轉變為工商業資本家，因為他有了股票、資金。政府給他的股票啊債券之類的，轉移到工商業，然後成為現在的大資本家。

**聽眾** | 我想問一下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會不會有失業、沒有找到工作？如果有，那在這期間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保障的？

**曹征路** | 應該說那個時候是國家來負責，不但是技術學校、中專學校可以「包分配」之外，就是社會閒散人員也有政府出面來組織互助性質的小企業。大家知道大陸剛剛解放的時候，仍然有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城市市民沒有工作，還有妓女、毒販等等一些社會醜惡現象。但是共產黨在兩年不到的時間裡全部消滅了這些東西，所有的妓女都被組織起來參加學習，參加勞動後，分配工作。當然這個工作不是享福了，要勞動，因為共產黨從它沒有成立的時候就在宣傳勞動是個光榮的事情，我說的這個勞動是體力勞動啊。在五四那個時代，包括後來成為國民黨重要高層的胡適啊，蔡元培啊，他們這些人，也都在高喊嘛，「勞工神聖」嘛，從此就是勞動者的世界嘛，當時他們也這樣。所以共產黨「勞動光榮」這個觀念在那個時代是非常流行的，

airiti

誰要是鄙視勞動，誰就被人瞧不起。有句話講「臉上搽著香，頭上油著光，只因不勞動，人人說他髒」。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風氣。所以不存在你說的失業問題。

金寶瑜 | 所謂的「兩條路線」就是劉少奇一直想要在工廠裡邊實行臨時工，他覺得中國農村有這麼多剩餘勞動力，應該把他們釋放出來，他就一直反對終身制。他去蘇聯「取經」，把蘇聯僱傭臨時工的這些方法帶回來，第一次帶回來就是大躍進，開始搞不下去；第二次又把臨時工的方法帶回來，就文化大革命，他搞不下去。就陽和平昨天講的嘛，假如你沒有飯碗的保障的話，你怎麼可能在工廠裡要求改革，你怎麼樣可以去跟老闆對抗說這個不合理那個不合理？所以這是很大很大的差異。工作是完全有保障的，當時最壞的就是犯了罪的罪人，否則光是工人他不能解僱你。

黃德北 | 我補充一下，我覺得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的時候，中國大陸就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戰後的嬰兒潮此刻已經大量地出現。大家都知道國營企業在容納勞動力上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為你不能像對待臨時工一樣對待他們，除了工資以外你還要給他們各種保險啊、宿舍啊等等福利的保障。所以實際上當時的很多國營企業已經沒有辦法吸納當時城市畢業的高中生。所以當時有兩種解決方法，一個就是上山下鄉，讓年輕人到農村去，第二個就是地方城市大量地興辦非國營的大集體企業。它不是真正的國有企業，但是是由地方政府來辦的。譬如說買一個簡單的設備，租一個五層樓的廠房，做鞋子、做襪子、做衣服的這樣一個簡單的小工廠。你跟國營企業的工人有一樣的工資，但是你沒有宿舍，也沒有很多的福利，或是有些福利是要比一般國營企業工廠的員工要差的。可是到後來，像這樣大型企業辦到一定程度也沒有辦法繼續辦下去了，因為沒有那麼多的大集體企業可以辦。所以我知道的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有很多城市高中生要畢業之後等很久才能分發到工廠裡面去，也就是說他得在城市裡邊待上半年到一年，才可能分發到國營企業或大集體企業裡面去。我覺得這個就是當時的年輕人就業開始出現的瓶頸問題。